# 雲南晉寧石寨山文化所見的 希臘化與內亞因素 \*

陳健文\*\*

## 提 要

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漢代古墓群所發現的文物中,出土了許多具有內亞草原文化特徵的文物,特別是所謂斯基泰一西伯利亞式的動物紋樣,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本文透過對石寨山文化的出土文物圖像進行分析,並進一步與中亞同一時期器物上之圖像材料來作比對,希望能釐清漢代雲南與內亞之間在族群與文化上的關連性,探尋內亞游牧民族與早期中國西南彼此之間在族群遷徙與文化接觸的互動關係。本文發現在某些服裝與武器上,滇文化與斯基泰一塞種、希臘化軍事文化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另一個可能的內亞文化特徵,是廣泛在滇文化出現的 S 形雙渦漩紋飾,這種紋飾初見於內陸歐亞西部,然後流行至西徐亞地區、歐亞草原東部、新疆與西藏等地,最後可能沿著青藏高原周緣而進入雲南地區。透過歷史文獻的比對分析,本文討論了內亞文化因素進入中國雲南地區的可能路徑,最後對可能影響石寨山文物的內亞因素來源提出歷史解釋。

關鍵詞:石寨山文化、内陸歐亞、希臘化文明、貴霜、S形雙渦漩紋飾、月氏

<sup>\*</sup> 收稿日期:2022年3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8月29日。 本文撰寫過程曾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105-2410-H-003-020-),另蒙審查人給予諸多改進意見,謹申謝忱。

<sup>\*\*</su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早在1986年,已故的童恩正先生曾提出中國有所謂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這是非常具有啓發性的一種概念,得到學界廣大的共鳴。我們可以發現內陸歐亞(以下簡稱內亞)系統的族群與文化很早便沿著青藏高原周緣一線,滲入了中國的西北甘青地區與西南川滇地區。這種草原與青藏高原周邊地帶的文化交流與族群互動,可能早自先秦時代即已開始。下迄秦漢時代,月氏與匈奴先後將勢力擴及至河西走廊,大量的內亞草原族群與文化相繼湧入青藏高原的周緣地區,留下了不少與內亞相關的文化遺跡。特別是在雲南地區,因石寨山出土了部分與草原相關的考古文化成分而引起學界的廣泛注意。究竟這些具有內亞色彩的文化遺存是如何出現在青藏高原周緣一帶?是透過何種路徑而進入雲南地區?他們又可能與哪些古代族群相關?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問題。有關青藏高原周緣中西交通之路線,學界早有所謂「羌中道」、「青海道」或「河南道」4之說,內陸歐亞的族群與文化曾沿著甘青一線南下進入中國西南川、滇地區,已獲得不少學界研究者的贊同。

早期中國西南地區的族群一直十分複雜,5在所謂的「西南夷」中,除氐羌系統的族群外,有百越系統的族群,也有與中南半島關係密切的孟-高系統族群,族類龐雜而經常難以從史料中釐清。但是在兩漢時期,青藏高原周緣的區域卻開始出現與胡人相關的圖像材料,特別是雲南晉寧石寨山考古出土物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內亞文化特徵,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點。對於這些內亞文化成分的來源,一個解釋的面向是將此歸諸於氐羌系統族群長期以來不斷與中國北方草原民族互動的結果,因此若干的內亞文化因素便透過氐羌系民族而傳至青藏高原的周緣地區,此種解釋較偏向從民族接觸交流的面向來觀察問題,先前學界的研究大多著眼於此。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即上述的內亞文化因素是透過族群的遷徙移動而進入到此一區域,特別是匈奴擊走月氏所帶來的歷史影響。

<sup>1</sup>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7-43。

<sup>2</sup> 初師賓,〈絲路羌中道開闢小議〉,《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2期,頁42-46。

<sup>3</sup> 吳焯,〈青海道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2期,頁123-140、86。

<sup>4</sup> 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68-195。

<sup>5</sup> 本文所謂的早期中國西南,指的是現今的川、滇及其鄰近地區,時間斷限約爲東周至秦漢。

對於雲南滇文化出土的動物紋飾與北方草原地帶文化間的關係,學界有兩種 不同的意見。一種認爲兩者之間有密切關係,有部分可能源自中亞甚至是西亞; 另一種則認爲二者間存在聯繫的證據不足,看不出有什麼承繼、交流和發展的 關係。6但一如霍巍指出的,在滇文化出土遺物中,存在著諸多明顯的外來文化影 響,而不只是單純地在某一件器物上出現某些跡象,說明這類文化因素的出現並 非孤例,<sup>7</sup>因此本文認同滇文化與內亞之間還是存在著不少可觀察到的文化接觸與 聯繫。有關雲南地區考古文化中的內亞文化成分,由於1950年代晉寧石寨山遺 址的發掘而受到學界矚目。早在1950年代, Robert von Heine-Geldern 已提出越 南東山文化中含有來自內亞草原游牧文化成分的觀點, 8 隨即引發學界的注意。如 William McNeill 在其著名的 The Rise of the West 一書中即採取了此種觀點,主張 早在西元前八世紀時,曾有一些游牧部落的騎兵可能經過四川而抵達華南沿海,9 Karl Jettmar 在 1964 年出版的 Art of the Steppes 一書中也呼應了此種內亞游牧族 群南下說, <sup>10</sup> 張光直在 1977 年的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第三版中,針對 雲南的考古文化也曾提出類似的見解。<sup>11</sup> 1970 年邦克(Emma C. Bunker)等人在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一書中提出滇文化之游牧文化成分可能與月 氏有關的看法, 12 邦克繼之在 1972 年的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sup>6</sup> Emma C. Bunker 著,趙永勤譯,〈滇國藝術中的「動物格門」和騎馬獵手〉,《雲南文物》,第26期(1989),頁129-131;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52、435;蕭明華,〈青銅時代滇人的青銅扣飾〉,《考古學報》,1999年4期,頁433-435;Kost Catrin, The Practice of Imagery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Steppe (5th-1st centuries B.C.E.)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4), 66. 有關此說主張者的論點,可參考霍巍、趙德雲,〈滇文化動物意匠與歐亞草原關係的再檢視〉,收入氏著,《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64-71。

<sup>7</sup> 霍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圖像的考察與漢晉時期中國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 學林》,第1卷2期(2004.3),頁60。

<sup>8</sup> 他的黑海遷徙説最初發表於 1951 年,參 Robert von Heine-Geldern, "Das Tocharer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 Saeculum 2 (1951): 225-255。英文論著可參 Robert von Heine-Geldern, "Some Tribal Art Styles of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 in Art History," in The Many Faces of Primitive Ar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Douglas Fraser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165-221.

<sup>9</sup>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238-239.

<sup>10</sup>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trans. Ann E. Keep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4), 215-216.

<sup>11</sup>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3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66-467.

<sup>12</sup> Emma C. Bunker, C. Bruce Chatwin and Ann 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0), 113.

Relationships to the Dong-son Culture"及 1983 年的 "Sources of Foreign Elements in the Culture of Eastern Zhou" 二文中皆點出石寨山文化中的若干成分可能與內亞有關。<sup>13</sup> 此外,1971 年 William Watson 在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一書中,也留意到滇文化與內亞斯基泰文化的親緣性。<sup>14</sup> 日本學者白鳥芳郎於 1978 年發表〈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スキタイ系文化の影響 ——種族=民族の交流とその經路〉一文,明確地將石寨山的若干文化成分定位為斯基泰文化,並嘗試將昆明族與烏孫做出聯繫。<sup>15</sup> 江上波夫亦留意到石寨山文化已經導入了鍍金的技法,而衆所周知在所謂的斯基泰一薩爾馬泰的動物意匠藝術中,鍍金技法是古代歐亞草原騎馬文化的要素之一,在西元前第一千紀後半葉以後即盛行於中國邊地的匈奴等游牧系諸族之中。<sup>16</sup> 1985 年,邱茲惠(Tze-huey Chiou-Peng)將此議題進一步發揮,以 The "Animal Style" Art of the Tien Culture 為題取得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sup>17</sup> 她認為雲南滇文化動物文樣的來源可能與氐族的活動有關。<sup>18</sup> 1989年 Basil Gray 在 Orientations 雜誌中撰文將雲南滇文化的游牧成分問題再度做了回顧,<sup>19</sup> Roberto Ciarla 與 Marcello Orioli 二人則在 1994 年對早期的內亞游牧族群

<sup>13</sup> Emma C. Bunker,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s to the Dong-son Culture,"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2, eds. Noel Barnard & Douglas Fraser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291-328; Emma Bunker, "Sources of Foreign Elements in the Culture of Eastern Zhou,"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ed. George Kuwayam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eattle: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84-93.

<sup>14</sup> William Watson,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1-152.

<sup>15</sup> 白鳥芳郎、〈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スキタイ系文化の影響 — 種族=民族の交流とその經路〉、收入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事業會編、《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 民族・文化篇》(東京:山川出版社、1978)、頁 193-214、譯文可參青山譯、〈從石寨山文化中看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響——種族、民族的交流及其途徑〉、《民族譯叢》、1980年4期、頁 49-54、60; 另見白鳥芳郎著、朱桂昌譯、〈石寨山文化的擔承者——中國西南地區所見斯基泰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譯叢》、第1輯(1982)、頁38-66。

<sup>16</sup> 江上波夫,〈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定住農耕民族と遊牧騎馬民族——古代日本騎馬民族国家成立過程の比較研究資料の紹介〉,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2 東アジア文明の源流》(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249;有關石寨山金屬器的鎏金研究,可參考李曉岑、韓汝玢、蔣志龍,〈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金屬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11期,頁75-85。

<sup>17</sup> TzeHuey Chiou-Peng, "The "Animal Style" Art of the Tien Cultur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5).

<sup>18</sup> TzeHuey Chiou-Peng, "Western Yunnan and Its Steppe Affinities," in *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I*, ed. Victor H. Mair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297-299.

<sup>19</sup> Basil Gray, "Once More Yunnan and Southeast Asia," Orientations 20.6 (1989): 44-51.

遷徙論提出批判,主張雲南的滇文化係受到隔鄰西藏東緣康區內亞游牧文化的影響。<sup>20</sup> 2000 年 Sophia-Karin Psarras 發表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一文,認為在中國西南的非漢族群中其實存在著更多的西方接觸。<sup>21</sup>

在中國大陸方面,對此用力最深者首推張增祺,他早期的〈關於晉寧石寨山青銅器上一組人物形象的族屬問題〉、〈古代雲南騎馬民族及其相關問題〉、〈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與〈再論雲南青銅時代「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者〉等論文堪稱是中國學界對此議題的奠基之作。<sup>22</sup> 而除了重要的考古報告《晉寧石寨山》外,<sup>23</sup> 目前他已出版近十本滇文化的專著,其中較重要者爲 2012 年的《中國西南民族考古》一書,<sup>24</sup> 書中收錄了多篇作者先前曾發表的重要論文,另外在 1997 年出版的《滇國與滇文化》第 11 章〈滇文化與外來文化關係〉與 2004 年出版的《探秘撫仙湖》一書中,<sup>25</sup> 張氏對此議題也有發覆。另一位著名雲南考古學者汪寧生 1979 年也有兩篇論文涉及石寨山文化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問題,分別是〈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像所見古代民族考〉與〈試論石寨山文化〉。<sup>26</sup> 霍巍與趙德雲則在張增祺研究的基礎上,發表〈滇文化動物意匠與歐亞草原關係的再檢視〉一文,對滇文化的動物紋樣問題有更進一步的探討。<sup>27</sup> 有關中國西南與中國北方、西北地區的文化聯繫問題,楊建華 2010 年透過對三叉式護手劍的研究,企圖闡明中國西部地區的文化交流,對西北與西南之間的考古文化親緣

<sup>20</sup> Roberto Ciarla, "A Long Debated Question: Pastoralism in South-West China. A Different Approach,"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 Bruno Genit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73-85; Marcello Orioli, "Pastoralism and Nomadism in South-West China: a Brief Survey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 Bruno Genit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87-108.

<sup>21</sup> Sophia-Karin Psarras,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Artibus Asiae 60.1 (2000): 5-58.

<sup>22</sup> 張增祺,《關於晉寧石寨山青銅器上一組人物形象的族屬問題》,《考古與文物》,1984年4期, 頁 88-92;張增祺,《古代雲南騎馬民族及其相關問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2期, 頁 13-20、77;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 1987年9期,頁 808-820;張增祺,《再論雲南青銅時代「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者》, 收入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青銅文化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 320-354。

<sup>23</sup> 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

<sup>24</sup> 張增祺,《中國西南民族考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

<sup>25</sup> 張增祺,《滇國與滇文化》(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7),頁 266-331;張增祺,《探秘撫仙湖》(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2),頁 213-225。

<sup>26</sup> 汪寧生、〈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像所見古代民族考〉、《考古學報》,1979年4期,頁423-439; 汪寧生、〈試論石寨山文化〉,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278-293。

<sup>27</sup> 霍巍、趙德雲、〈滇文化動物意匠與歐亞草原關係的再檢視〉,頁 51-80。

性提出了交流路徑的推測。<sup>28</sup> 但邱茲惠的看法不同,她從合鑄技術的角度切入,認 爲西南與北方地區的三叉式護手劍雖有相似性,但卻是各自獨立創造的結果。<sup>29</sup> 類似的研究也見於郭物的〈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爲中心〉,<sup>30</sup> 以及翟國強的〈滇文化與北方地區文化及族群關係研究〉與〈北方草原文化南漸研究——以滇文化爲中心〉等論文。<sup>31</sup> 此外,劉珂、蔡郎與二人認爲滇文化金器中的草原母題,其製作者應是出自於入滇的塞人工匠,<sup>32</sup> 祝銘近來也有相關的研究。<sup>33</sup> 而韓汝玢與李曉岑的〈雲南古滇地區的金屬製作技術與北方草原青銅器〉一文,則試圖透過冶金考古的研究路徑來探索此一議題。<sup>34</sup>

先前有關滇文化中的內亞文化因素討論,大多集中在所謂草原藝術母題(或斯基泰藝術)議題上,或是討論西南地區兵器的中國北方草原特色。其實晉寧石寨山文化中的內亞成分較少被留意者,是其若干軍事裝備造型與中亞希臘化文明(大月氏、貴霜)所表現的類同現象,<sup>35</sup>究竟二者間有無接觸或交流的可能性?是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童恩正在〈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這篇遺作中認爲,雲南滇文化中的若干中亞文化因素可能是透過印度而輸入到中

<sup>28</sup> 楊建華,〈三叉式護手劍與中國西部文化交流的過程〉,《考古》,2010年4期,頁71-78。

<sup>29</sup> Tzehuey Chiou-Peng, "Spiral Handle and Three-Pronged Guard: Stylistic or Technical Traits?" in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aterial concern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ed. Anke Hein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109-121.

<sup>30</sup> 郭物,〈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爲中心〉,收入劉慶柱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考古學視野下的城市、工藝傳統與中外文化交流:劉慶柱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240-267。

<sup>31</sup> 翟國強,〈滇文化與北方地區文化及族群關係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1期,頁73-86:翟國強,〈北方草原文化南漸研究——以滇文化爲中心〉,《思想戰線》,2014年3期,頁18-30。

<sup>32</sup> 劉珂、蔡郎與,〈試論「塞人」黃金工藝入滇〉,《中華文化論壇》,2016年9期,頁95-103。

<sup>33</sup> 祝銘,〈從金銀飾看歐亞草原文化對滇文化的影響〉,《草原文物》,2019年2期,頁63-75。

<sup>34</sup> 韓汝玢、李曉岑,〈雲南古滇地區的金屬製作技術與北方草原青銅器〉,收入北京科技大學冶金 與材料史研究所編,《中國冶金史論文集·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56-66。

<sup>35</sup> 有關貴霜是否為大月氏所建,學界長期以來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貴霜為大月氏所建,參傳鶴里(Harry Falk)撰、慶昭蓉譯、〈月氏五翕侯〉,收入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14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 123-182;楊富學、〈靴扣:貴霜王朝建立者源自大月氏新證〉,《敦煌研究》,2020年5期,頁 11-21;另一派則認為貴霜的建立者是先前早一步入侵阿富汗地區的塞種人部落,參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32-37;余太山,《貴霜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5-19。本文在描述西元前 2-1 世紀統治中亞大夏(Bactria)地區的游牧政權時使用大月氏,西元後該區的政權則稱貴霜,而對於年代介於西元前後的考古遺址像卡爾查延(Khalchayan)王宮一類者,則並稱「大月氏或貴霜」。

國南方,<sup>36</sup> 這是值得參考的一種見解,而謝崇安在 2004 年也發表過類似的研究〈略述石寨山文化藝術品中所見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跡〉。<sup>37</sup> Lucas Christopoulos 曾對早期希臘人、羅馬人與中國的互動歷史有過梳理,<sup>38</sup> 劉豔最近有兩篇論文,從冶金史的角度論及早期中國與希臘化世界的交往,<sup>39</sup> 楊巨平甫出版的《互動與交流:希臘化世界與絲綢之路關係研究》一書,則展現了楊氏近年來對東方希臘化世界的研究成果。<sup>40</sup> 個人認爲這些中亞希臘化文明成分與雲南交流的路徑,除了從西北的青藏高原周緣或是透過印度中介都是可能的途徑外,直接從西藏交通的這種可能性其實也不能排除,雲南與古代內陸歐亞之間的文化聯繫,其內涵之複雜值得學界去做更深入的探索。

本文擬透過考古圖像資料之比對,配合文獻研究,希望能釐清早期中國西南 與內亞之間的文化接觸與交流,揭示漢代雲南與內亞之間在族群與文化上的關連 性,追索內亞游牧民族與早期中國西南彼此間在族群遷徙與文化接觸的互動關係。

# 二、石寨山出土人物形象與斯基泰 – 塞種系游牧民之間的親緣性

中國西南邊境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遺址發掘於 1955 年,最初認為墓葬 的年代可以早到戰國末期,而其下限年代則在西漢晚期、東漢初期。<sup>41</sup> 不過近來

<sup>36</sup> 童恩正,〈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考古》,1999年4期,頁79-87。

<sup>37</sup> 謝崇安,〈略述石寨山文化藝術品中所見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跡〉,《四川文物》,2004年6期,頁28-33。

<sup>38</sup> Lucas Christopoulos, "Hellenes and Romans in Ancient China (240 B.C.-1398 A.D.)," Sino-Platonic Papers 230 (2012): 1-79.

<sup>39</sup> 劉豔,〈漢帝國與希臘化世界的交往——再議海昏侯墓金器中的花絲裝飾〉,《早期中國研究》, 第4輯(2021.3),頁161-188;英文版參見 Yan Liu, "The Han Empir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Prestige Gold and the Exotic Horse,"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Archaeometry* 20.3 (2020): 175-198;劉豔、于建軍、楊軍昌、李文瑛,〈與地中海世界的遠距離聯繫?——新疆阿勒泰地區東塔勒德墓地出土山毛櫸果造型的黃金垂飾研究〉,《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8輯(2022.6),頁1-24。

<sup>40</sup> 楊巨平,《互動與交流:希臘化世界與絲綢之路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2)。

<sup>41</sup> 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年1期,頁63;張增祺,《晉寧石寨山》,頁110。M. Pirazzoli-t'Serstevens(畢梅雪)認爲滇文化的年代在西元前250年至西元50年之間,參見米歇爾·皮拉左里著,吳臻臻譯,〈滇文化的年代問題〉,《考古》,1990年1期,頁86。

的發掘已將該文化的上限提早至春秋時期,並認爲俗稱的「滇文化」只是石寨山 文化晚期階段的遺存。<sup>42</sup>雲南的古滇國是一個文化多元、族群多樣的古國,分布 著氐羌、百越、濮人等民族群體,43 然該墓葬群的特色是出土了許多具有北方草原 文化特徵的文物,特別是所謂斯基泰-西伯利亞式的動物紋樣(Scythian-Siberian animal motifs),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引人注意者爲其中一組青銅納貢貯 貝器上的人物形象,具有明顯的「高鼻多鬚」特徵(圖1),該墓中另一件鎏金銅 扣飾上所描繪的人物造形,也同樣具有高鼻深目的面部特徵(圖2),另外在李家 山墓葬出土的貯貝器上也有一身著窄袖長褲配長劍之人物,衣褲飾有圓形與菱形 紋,髮型成椎髻狀(圖3),亦具有高鼻深目之特徵。44 而這三組特殊人像在服裝 造型上也與同墓葬出土的其他人物圖像不同,他們有窄長過手的衣袖和下及足背 的長褲,這些都不是西南少數民族歷來的服飾習慣,尤其是其中有一人蓄鬚長及 腹部,這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實屬罕見,至於「高鼻深目」那更不是西南民族 常見的形象特徵。有關這兩組人像的族屬,張增祺早已指出其應與塞種人(Saka) 有關,他認爲這二組圖像表現的,就是《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提到的「雟人」 或「叟人」。他們原來並不是雲南的土著少數民族,而是源自於中亞地區和斯基泰 人有血統關係的「塞人」,亦即古史所稱的「塞種人」,而「雟」即是「塞」的音 譯。<sup>45</sup> 雖然張增祺已針對這兩組人像的高鼻深目、蓄鬚、著靴與褲等方面有過論 證。但本文擬在張氏的基礎上對其塞人特徵再做出一些補充論證,特別是衣褲上 的圓形、菱形紋案與長劍這兩點斯基泰人的明顯特徵。

從這三組人像的服飾觀之,他們的衣服上有呈菱形狀、彎月狀或圓形的紋飾,這與斯基泰人的服飾幾乎相同。在西方所發現的斯基泰人文物圖像中,斯基泰人除了身著緊身衣褲外,衣褲上經常可見這類的菱形狀(圖4、5)、圓形(圖6)或彎月形(圖7)的花紋。就石寨山文化中的這兩組人物形象來看,不但是在外

<sup>42</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館、晉寧縣文物管理所編著,《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 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153、157。

<sup>43</sup> 趙永勝,《中國西南與中南半島古代民族源流、分布及其演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19),頁75。

<sup>44</sup> 張增祺,《滇國與滇文化》,頁 285。

<sup>45</sup> 張增祺,《關於晉寧石寨山青銅器上一組人物形象的族屬問題》,頁88-92;張增祺,《晉寧石寨山》,頁140-143。但針對鎏金銅扣飾上所描繪的人物,童思正認爲是印度人,參見氏著,《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頁82。

貌上,尤其是衣褲上的圓形與菱形狀紋樣與西方斯基泰人之服飾實無二致。此外李家山 M69 貯貝器上人像之髮式爲椎髻(圖3),此種髮型也常見於南俄(圖8)、南西伯利亞(圖9)的斯基泰人與中亞之塞種、月氏等游牧民族(圖10)。雖然漢代史籍早有西南民族行椎髻習俗之記載,<sup>46</sup> 但是此人物在外貌與服飾上同時顯現的內亞特點,還是令人不得不將其與斯基泰系游牧民族做出聯繫。在遙遠的中國西南邊區竟能發現與幾千公里外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相同的服飾文物,此點著實令人驚訝。白鳥芳郎早已表明石寨山騎士穿著的褲裝,與黑海、裏海周圍及亞美尼亞古代游牧民族的服裝十分類似,而兩者的類似絕不能認爲是偶然的巧合。<sup>47</sup>

其次值得留意的是這兩組人像腰間所配帶的長劍形式,<sup>48</sup> 正是典型的斯基泰一薩爾馬泰式長劍(圖 11),而此種長劍也是貴霜武士的常見裝備,著名的迦膩色迦王雕像上所佩帶的長劍即是明顯的例子(圖 12)。另一個可供比擬的例子是阿富汗黃金之丘(Tillya Tepe)墓葬中的 4 號墓,墓主疑似是位生活於西元前後的早期游牧民族(大月氏?)君長,這位身材高大的墓主也隨葬著一把長劍(圖 13)。因此若就此兩組人像的臉部外貌、服飾與所配帶之長劍觀之,其族群與斯基泰一塞種間的親緣性不言可喻。可以發現青銅納貢貯貝器上這組人物所配的長劍幾乎著地,就考古資料來看,馬薩蓋特人(Massagetae)和塞種在西元前六至五世紀之交便開始使用長劍,來自 Tagisken 所出土的長劍即長達 118 公分,<sup>49</sup> 而類似超過 1 公尺的長劍在伊列克(Ilek)河附近的薩爾馬泰(Sarmatian)墓葬中也可發現,在此處發現的長劍有些長度甚至可達 1.3 公尺,接近此種超過 1 公尺的長劍尚可見於西土庫曼的烏茲伯伊(Uzboi)河流域。<sup>50</sup> William Trousdale 推測此

<sup>46《</sup>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 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見(漢)司馬遷,《史記》(點校 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16,〈西南夷列傳〉,頁2991。有關內亞游牧民族之椎髻習 俗,可參考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臺灣 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9),頁54-56。

<sup>47</sup> 白鳥芳郎著,朱桂昌譯,〈石寨山文化的擔承者——中國西南地區所見斯基泰文化的影響〉,頁50。

<sup>48</sup> 王大道等認爲這些身上配長劍的人像反映的應是將軍、酋長或類似的上流階級人物。參見 Jessica Rawson, *The Chinese Bronzes of Yunnan*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3), 221.

<sup>49</sup> Marek Jan Olbrycht, "Arsacid Iran and the Nomads of Central Asia – Ways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s. Jan Bemmann & Michael Schmauder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369.

<sup>50</sup> Burchard Brentjes, Arms of the Sakas (and Other Tribe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s) (Varanasi: Rishi

種源自中亞草原的長劍,是透過月氏人而傳入中國。<sup>51</sup> 雖然邦克力主騎馬時配戴長劍有其種種的不便,古代游牧民族在實務上不可能配戴長劍,<sup>52</sup> 但長劍是古代中亞塞種人的重要武器裝備是無可否認的。秦始皇陵曾出土不少類似的長劍,下迄漢代,士大夫也習慣配戴長劍。然而在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以前,所見的劍一般說來都比較短,發展至秦朝時劍身才逐漸變長,<sup>53</sup> William Samolin 早已指出中國先秦時期的長劍應是受到西方中歐 Hallstatt 文化的影響,<sup>54</sup> 中國自先秦時期開始使用劍這類武器,羅森(Jessica Rawson)爵士認爲疑似是受到草原民族的影響,或與西方單兵近戰的武器傳統有關。<sup>55</sup>

在石寨山文化中也可觀察到希臘化軍事文明在當地的可能影響,此應與亞歷山大東征後所造成的中亞希臘化背景有關,特別是希臘人在當地建立的希臘化大夏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 250-130 B.C.E.)。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學習與採用他地新而有效的軍事技術,在古代世界非常普遍。邦克已發現滇國的騎馬獵手習慣使用長矛而非歐亞草原東部民族習用的弓箭,而此點卻與希臘人盛行使用長矛的習慣相似,另外用佩帶掛劍一事亦與地中海及古代近東的習俗相近,特別是護脛的鎧甲顯示出源自古希臘的傳統,說明其與地中海區域有著遙遠的聯繫。56 E. R. Knauer 亦曾討論過希臘式護甲具在東方的流布問題,她注意到石寨山滇文化戰士身上所著的護甲是典型希臘式的。57 張增祺也指出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銅腿

Publications, 1996), 23.

<sup>51</sup> William Trousdale, *The Long Sword and Scabbard Slide in Asia*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5), 71-85。林梅村亦有相近的見解,參見氏著,〈商周青銅劍淵源考〉,收入氏著,《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39-63。

<sup>52</sup> Emma C. Bunker, "Sources of Foreign Elements in the Culture of Eastern Zhou," 85-86; Emma C. Bunker, "The Steppe Connection," *Early China* 9/10 (1983-85): 72-73.

<sup>53</sup> 袁仲一,〈釋「王負劍」〉,收入徐衛民、雍際春主編,《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14。

<sup>54</sup> William Samolin, "Western Elements in the Art of Ch'u,"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1*, eds. Noel Barnard & Douglas Fraser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194-196.

<sup>55</sup> Jessica Rawson, "Steppe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le of Hand-to-hand Combat,"《故宫學術季刊》,第33卷1期(2015.9),頁38-42;有關中國與中亞單兵裝備之比較,另參李韜,〈秦漢時期中原與中亞地區單兵制式化裝備比較研究試析〉,收入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吐魯番學研究——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游牧民族的起源與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37-174。

<sup>56</sup> Emma C. Bunker 著, 趙永勤譯, 〈滇國藝術中的「動物格門」和騎馬獵手〉, 頁 130-131。

<sup>57</sup> Elfriede R. Knauer, "Knemides in the East?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act of Greek Body Armor on

甲與斯基泰人使用的銅腿甲,在器形、大小與製法上基本相同。<sup>58</sup> 而在一個擴掠扣飾上,可見到兩個著頭盔的武士人像(圖 14),其頭盔樣式可與中亞 Dalverzin Tepe 西元二至三世紀 <sup>59</sup> 壁畫上的貴霜頭盔類比(圖 15),依據 Kazin Abdullaev 的觀察,該壁畫頭盔的樣式屬於希臘式,戰士脖子疑著有護領鎧甲,其形式類似卡爾查延(Khalchayan)王宮浮雕上的頭盔型制,<sup>60</sup> 這類型的希臘式頭盔是接近所謂「古風型頭盔(Attic-type Helmet)」。<sup>61</sup> 而在戰爭貯貝器上戰士所戴的鋼盔外型(圖 16),其形制與斯基泰人所使用之希臘頭盔(圖 17)或安息人(Parthians)的希臘式頭盔亦非常相近(圖 18)。<sup>62</sup> 值得留意的是此類的頭盔早在戰國末期,已出現在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的兩件鉛俑上(圖 19)。此二鉛俑上的尖帽似非軟性的皮帽,可觀察到帽緣下方兩側結構其實有護耳設計,故應比較接近頭盔而非皮帽,而斯基泰人經常佩戴希臘式的頭盔,足見此類斯基泰式之希臘頭盔流佈至中國的時間疑可上溯至先秦時期。

此外尚可觀察到擄掠扣飾上最左一人手持類似鶴嘴斧之武器,鶴嘴斧是歐亞草原早期游牧人的慣用武器之一,阿爾泰地區曾出土了斯基泰時期的鶴嘴斧實物,<sup>63</sup> 鳥恩認爲鶴嘴斧的源頭可能要追溯至近東的伊朗。<sup>64</sup> 在昆明羊甫頭也出土過直接呈

<sup>&</sup>quot;Barbarian" Tribes," in *Nomodeiktes: Greek Studies in Honor of Martin Ostwald*, eds. Ralph M. Rosen and Joseph Farrel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247-251.

<sup>58</sup> 張增祺,〈再論雲南青銅時代「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者〉,頁 333:張增祺,《探秘撫仙湖》,頁 218。

<sup>59</sup> Harmatta, János.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298:中譯本參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 第二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 2002),頁231。

<sup>60</sup> Kazin Abdullaev, "Nomadism in Central Asi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nd-1st Centuries B.C.)," in *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 Papers on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 in Antiquity*, ed. Antonio Invernizzi (Firenze: Le lettere, 1995), 154, fig. 3.

<sup>61</sup> Valerii Nikonorov, *The Armies of Bactria 700 B.C.- 450 A.D. Vol. 2* (Stockport: Montvert Publications, 1997), 32.

<sup>62</sup> 這個明顯是希臘風格的頭盔極可能出自希臘工匠之手,參見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in As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5), 73-74.

<sup>63</sup> Vyacheslav Molodin & Natalya Polosma'k, "Southern Siberia During the Bronze and Early Iron Periods," i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 3 West and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eds. Colin Renfrew & Paul Bah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54, fig. 3.14.8; Tsagaan Törbat, Pierre-Henri Giscard and Dunbüree Batsükh, "First Excavation of Pazyryk Kurgans in Mongolian Altai," in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eds. J. Bemmann, H. Parzinger, E. Pohl, D. Tseveendorj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t Bonn, 2009), 227, fig. 10.

<sup>64</sup> 鳥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文化比較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匈奴時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55-157。

勾子狀的兵器,但因頭部呈現扁平而被歸屬於錛類之器物,不應與此類比,<sup>65</sup>且此兵器因斧垂明顯突出,故應還是屬於鶴嘴斧之類的武器。<sup>66</sup>邦克早先即留意到石寨山文化中部分飾有動物的刀與管銎斧可以追溯至西伯利亞中部、高加索與近東的藝術傳統,這類的器物在南西伯利亞商代末期的卡拉蘇克(Kararsuk)文化與稍晚的塔加爾(Tagar)文化,以及伊朗西元前第一千紀的盧尼斯坦(Luristan)均有發現。<sup>67</sup>邱茲惠亦認爲此類器形源自北方草原青銅文化,而其在西南地區之重現爲一種文化滯後的現象,其傳播路線可能相當迂迴。<sup>68</sup>

石寨山文化中的內亞軍事因素尚有擴掠扣飾上兩名著頭盔武士的戰袍(圖20),可與深受內亞草原塞種影響的中亞魚鱗甲戰袍類比。石寨山擴掠扣飾上最左與最右的兩位武士除著希臘式頭盔外,兩人皆身著護頸的高領魚鱗甲式戰袍,這種高領護頸戰袍是大月氏、貴霜武士常見的一種軍事裝備。一個可類比的例子是刻繪在卡爾查延(Khalchayan)王宮大殿上的大月氏或貴霜王族騎射場景,<sup>69</sup> 其中一位重裝騎兵即身著此類的戰袍(圖 21),在該遺址中也曾出土過這種戰袍的雕塑與頭像,<sup>70</sup> 可以觀察到石寨山戰袍的雙臂有管節狀箍環形的護臂設計,此種結構亦見於卡爾查延與大夏地區大月氏或貴霜統治時期的游牧戰士戰袍(圖 22)。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薩馬爾干(Samarkand)附近奧拉特(Orlat)遺址 2 號墓所出土的一件骨雕帶扣飾,上面刻畫了一個戰爭的場景,其中畫面上貴霜重裝武士身上所穿的正是此種高領護頸戰袍(圖 23)。這類片甲(魚鱗甲)狀的戰袍可能源自於塞種人,在西元前二至一世紀印度一塞種人統治者留下的錢幣上,已可觀察到此種類型的長戰袍(圖 24),這類的戰袍或許是月氏人從其役屬下的塞種人那邊學習而來的,<sup>71</sup> 而隨後此種魚鱗甲戰袍更自胡韋色迦(Huvishka)時期開始在貴霜帝國之中

<sup>65</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昆明羊甫頭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卷一,頁56、210-211。

<sup>66</sup> 王大道等也認爲這件武器是戰斧,參見 Jessica Rawson, The Chinese Bronzes of Yunnan, 239.

<sup>67</sup> Emma C. Bunker,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s to the Dong-son Culture," 302.

<sup>68</sup> 邱茲惠,〈滇青銅文化多元藝術風格的涵義〉,收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編,《東亞古物 [A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50。

<sup>69</sup> 有關卡爾查延王宮的年代,挖掘者 Pugachenkova 認為在紀元之初,Olbrycht 認為在西元前一世紀後半葉,參見 Marek Jan Olbrycht, "Arsacid Iran and the Nomads of Central Asia – Ways of Cultural Transfer," 348-349.

<sup>70</sup> Svetlana Gorshenina et Claude Rapin, *De Kaboul a Samarcande* (Paris: Gallimard, 2001), 3; János Harmatta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343-344, fig. 13, 15.

<sup>71</sup> Valerii Nikonorov, The Armies of Bactria 700 B.C.-450 A.D. Vol. 2, 50; Jangar Ya. Ilyasov & Dmitriy

流行。<sup>72</sup> 當然我們可以發現石寨山戰袍較之中亞的高領戰袍,最大的區別是石寨山戰士下半身腿部未著長褲,這應是受當地氣候或民族傳統所做出的調整。其實任何一種物質文化或藝術風格傳到異地後,很少不會略微發生變形或被稍事改造,因創始效應(founder's effect)的影響,母文化與其分支文化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sup>73</sup> 但在總體上其與中亞戰袍的淵源關係應是可明顯觀察到的。

另外在奧拉特帶扣飾上的貴霜武士裝備中,也看到他們配戴了長劍,此長劍 造型與前述貯貝器上高鼻多鬚人物的配劍基本一致,Jangar 與 Dmitriy 二人除指出 此長劍與薩爾馬泰式長劍的關係外,也點出其中長劍的玉質劍格(護手)及玉瑋 (固定在劍鞘上作爲掛劍用之劍鼻)極可能是受中國漢劍配飾的影響,甚至是從 中國進口的。此外,戰爭畫面中的一位武士可看出手持鶴嘴斧,二人認爲其型制 接近阿爾泰一帶流行的鶴嘴斧(圖25),74 因此該擴掠扣飾上滇國戰士的造型與中 亞的大月氏或貴霜游牧戰士幾無二致。此外,奧拉特骨雕帶扣上武士所戴的希臘 式頭盔,也與戰爭貯貝器上的著頭盔人像類似,特別是二者頭盔上都裝飾著纓穗 (參圖 16),此種頂部有小孔並固定有一束纓穗的頭盔被列入所謂「庫班哥薩克」 式橢圓盔型帽,早在西元前第一千紀中葉就廣泛流行於斯基泰諸族活動的西亞至 中亞之廣闊地域,<sup>75</sup> 而奧拉特大月氏或貴霜戰士使用長矛作爲戰爭武器的習慣,一 如前述邦克所言亦見於滇國的獵手。76是以從奧拉特帶扣飾上大月氏或貴霜武士 之高領魚鱗甲戰袍、鶴嘴斧、希臘頭盔三者與石寨山擴掠扣飾上兩位武士造型明 顯一致來看,石寨山文化的古滇人在軍事裝備上應與中亞希臘化文明有過某種程 度的互動接觸,其時間應在貴霜早期之前即已開始,當然其中長劍部分也可能包 含來自中國的因素。有關這件骨雕帶扣飾的年代,學者間的意見頗爲分歧,學者 主張的年代斷限從西元前2世紀到西元後4世紀都有,77不過若參照石寨山文化的

V.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98): 116, 121.

<sup>72</sup> Frantz Grenet, "The Nomadic Element in the Kushan Empire (1st-3rd Century A.D.),"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3 (2012): 12.

<sup>73</sup> 焦天龍,《中國考古學概念的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39。

<sup>74</sup> Jangar Ya. Ilyasov &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119, 122-123.

<sup>75</sup> 安娜托莉婭·普加琴科娃著,李琪譯,〈粟特藝術中的康居人形象——烏茲別克斯坦藝術學考察隊的發現〉,《西北民族論叢》,第4輯(2006.3),頁234: Jangar Ya. Ilyasov &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116-117.

<sup>76</sup> Emma C. Bunker 著,趙永勤譯,〈滇國藝術中的「動物格門」和騎馬獵手〉,頁 130-131。

<sup>77</sup> 參見 B. A. Litvinsky, "The Bactrian Ivory Plate with a Hunting Scence from the Temple of the Oxus,"

斷代在戰國末至東漢早期來看,<sup>78</sup> 這件骨雕帶扣飾的年代應不至於晚至西元後 4 世紀,西元前後還是較爲可能的斷代。

石寨山文化中另一與斯基泰一塞種文化相關的文化因素是尖頂高帽。在石寨山附近的江川李家山遺址,曾出土一件四舞俑銅鼓(M69:162),其中兩人頭上戴著一種高筒尖頂帽(圖 26),至於此銅鼓的年代,M69 墓葬被歸類於該遺址文化的第三期,約當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sup>79</sup> 此類的尖帽在伊朗、中亞及阿爾泰地區經常可見,希羅多德(Herodotus)在其所著《歷史》中即曾描述中亞的塞種人「戴著一種高帽子,帽子又硬又直,頂頭的地方是尖的」。<sup>80</sup> 此類斯基泰高頂尖帽在波斯貝希斯登(Behistun)崖刻、七河地區伊斯塞克(Issyk)庫爾干(圖 27)與阿爾泰的阿爾然(Arzhan)2 號墓(圖 28),都可以見到此種高頂之尖帽,而有關此種尖帽的起源,Karlene 認爲應來自草原而非近東。<sup>81</sup> 雖然石寨山尖帽帽沿較寬鬆,然一如前述,物質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受創始效應影響,發生略微變形的情況是很普遍的,但大體上其型制與阿爾然 2 號墓的尖帽還是非常相近。這類的高頂尖帽出現在雲南石寨山附近,說明了古滇人疑似與來自內亞草原地區的斯基泰一塞種文化曾有過接觸互動。

總之,早期在雲南一帶疑有部分與斯基泰-塞種有關的族群曾在此活動,此點 張增祺教授早已指出,上述這些滇文化人物之服飾與武器所顯示的內亞文化特徵 應與此有關。筆者還注意到在該遺址甲區第一號墓所出土的一種銅斧上有一鏤刻 的人頭像,其「高鼻深目」的特徵也很明顯(圖 29),所描繪者疑似是來自內亞一 帶的民族形象,這些高加索種系內亞族群在該地的活動,值得學界更多的關注。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2001): 145-148.

<sup>78</sup> 張增祺,《晉寧石寨山》,頁 109-112。

<sup>79</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頁228、232;另參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南江川縣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考古》,2001年12期,頁36、40。

<sup>80</sup>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eorge Rawlinson*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538 (7.64). 中譯本參 Herodotus 著,王以鑄譯,《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7),頁 487。

<sup>81</sup> Jones-Bley Karlene, "Tall Hats: Reaching to the Sky," 收入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吐魯番學研究: 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游牧民族的起源與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94。

### 三、石寨山S形雙渦旋紋飾與内亞文化的關係

在晉寧石寨山文化中,於年代屬於西漢中早期甚至更早之前的 M71 大型墓中曾發現一種 S 形的雙渦旋紋金飾(圖 30),82 其具體功能不明,一模一樣的雙渦旋紋金飾同時也見於年代在西漢中期至東漢前期的江川李家山墓葬 M47 號墓(圖 31)。83 與石寨山跟李家山 S 形雙渦旋紋金飾極爲類似的樣本,曾出現於東南歐巴爾幹半島 Alvinc/Vintu de Fos 的一件西元前八世紀 Hallstatt 文化青銅鈕(圖 32),此件文物被認爲是與黑海北岸的早期游牧文化有關。84 另一個年代相近可以類比的例子,是內蒙古察右後旗東漢晚期三道灣墓地出土的銅耳墜,其樣式是左右對稱的 S 形雙渦旋紋(圖 33)。張增祺也已留意到李家山旋紋金飾與斯基泰人的金指飾皆是用粗金絲扭曲成雙旋紋,二者非常相似。85 其實在歐洲的青銅時代考古中,常可見到類似的雙渦旋紋小飾件(圖 34),與之接近之雙渦旋紋飾環在中亞青銅時代考古中亦可見到,烏茲別克撒馬爾干附近澤拉夫善(Zeravshan)河左岸年代距今約四千年左右的 Tugai 遺址,也出土過雙渦旋紋飾環,此種環飾與歐洲青銅時代之考古出土物相當類似(圖 35),可能與早期印歐人的文化有關,但這類的飾件的功能仍不十分清楚。

與此類似的 S 形雙渦旋紋樣在當地發現不少,如李家山墓葬另有一銅背甲 (24:63)(圖 36)與銅箭菔(圖 37)上亦出現同類的雙渦旋紋,雙渦旋紋飾同樣出現於鄰近年代在戰國中期至西漢末年的昆明羊甫頭遺址中,<sup>86</sup>其中一個編號 01YC:102的銅腰扣上外圈即裝飾著相同的雙渦旋紋(圖 38),另一個相似的紋飾則出現在雲南牟定縣福土龍村所出土可能是戰國時期的編鐘上(圖 39)。邦克與張光直很早便留意到在雲南以石寨山爲代表的滇文化中,S 形紋飾是一種相當獨特

<sup>82</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館、晉寧縣文物管理所編著,《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 掘報告》,頁157。

<sup>83</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南江川縣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頁 36-37;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頁 231-232;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2期,頁151。

<sup>84</sup> Tibor Kemenczei, "Hungarian Early Iron Age Metal Find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Stepp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 Bruno Genit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599-601, 614, fig. 13.3.

<sup>85</sup> 張增祺,《探秘撫仙湖》,頁219。

<sup>86</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昆明羊甫頭墓地》,卷參,頁715。

的母題,<sup>87</sup> 而這種 S 形雙渦旋紋可能也與內陸歐亞的早期文化因素有關。

S 形雙渦旋紋早在西元前二千年前後愛琴海克里特島文明的米諾斯(Minos)王宮遺址已經出現(圖 40),<sup>88</sup> 而渦旋(螺旋)紋的傳統甚至可以追溯至烏克蘭聶伯河南岸的特里波里(трипольской Tripolye)文化,在距今約 6200-6050 年前羅馬尼亞東北部的 Cucuteni 文化陶器(圖 41)與 5600-4900 年前特里波里文化的陶器上(圖 42),已經出現了雙渦旋紋,這種裝飾圖案可能從巴爾幹希臘沿岸地區傳到愛琴海諸島,而被克里特的藝術所吸收。<sup>89</sup> 至遲於西元前第二千紀,渦紋飾件廣布於希臘、高加索地區及伏爾加河下游。西元前第一千紀,除上述地區外亦流布於南俄一烏克蘭草原,之後更往東分布於大夏、中國北方與蒙古等地。<sup>90</sup> 渦旋紋是內亞地區一種相當受到偏愛的紋樣,有著很深的歐亞草原文化淵源,<sup>91</sup> 是內亞地區一種極具特徵的裝飾紋樣,而這種雙渦旋紋不僅出現在雲南地區,更還見於中南半島越南北部的東山文化。<sup>92</sup> Robert Heine-Geldern 早已指出越南東山文化出土青銅劍柄(圖 43)及帶扣(圖 44)上的雙渦旋紋飾,是來自內亞西部多瑙河地區與南俄、高加索地帶的一種文化因素,特別是與當地的 Hallstatt 文化有關,高加索地區出土的一件青銅帶扣上也裝飾著相同的雙渦旋紋飾(圖 45)。他認爲這類紋飾是透過西元前一千紀的某種族群(也許是希梅里安人〔Cimmerians〕或吐火羅

<sup>87</sup> Emma C. Bunker,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s to the Dong-son Culture," 301-302, 325;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3rd edition, 466.

<sup>88</sup> 此中空圓筒物出土於米諾斯文明早期的 EM III 期,參見 Arthur Evans, The Palace of Minos: 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the Early Cretan Civiliz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Discoveries at Knossos (London: Macmillan,1928), 194。有關米諾斯王宮的始建年代,應在米諾斯考古年代學中的 EM III — MM IA 期,即 ca. 2200-1900 B.C.,參見 John C McEnroe, Architecture of Minoan Crete: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31, 54。米諾斯王宮時代延續至西元前 1600 年,另參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巴里·鮑威爾(Barry B. Powell)著,陳恒等譯,《希臘人:歷史、文化和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61。

<sup>89</sup> В.И. 庫濟辛 (В. И. Кузищина) 主編, 甄修鈺、張克勤等譯, 《古希臘史》(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學出版社, 2013), 頁 53-54。

<sup>90</sup> 馬豔,〈商都東大井類渦紋飾件與內陸歐亞西部渦紋裝飾元素〉,《邊疆考古研究》,第22輯(2017.12),頁146。

<sup>91</sup> 潘玲,〈兩漢時期東北地區和長城地帶的三種耳墜〉,收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新果集——慶祝林澐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431。

<sup>92</sup> 有關越南北部東山文化的年代,學者間雖同意雲南滇文化與東山文化大體同時,但越南學者傾向定在西元前八至七世紀,中國與西方學者則一般將之定在西元前600至前400年。碳十四定年的數據多落在800-200 B.C.,下限一般以西元43年二徵姊妹被平息爲標誌。但林永昌認爲東山文化的上限不大可能早於滇文化,其上限可能相當於西元前四至前三世紀。參見氏著,〈東山文化的若干問題再檢討〉,《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5),頁115、120。

人〔Tokharians〕)移動或文化聯繫,從歐亞草原西部的東歐與高加索地區往東,通過中亞、新疆、內蒙古進入中國後,沿著甘肅、四川、雲南而抵達中南半島的東北部。<sup>93</sup> 儘管 Heine-Geldern 的黑海移民(Pontic Migrations)傳播理論曾受到批評,<sup>94</sup> 但是無庸置疑他對雙渦旋紋飾流布的觀察仍相當有啓發性。William Samolin也指出,周代青銅器上的 S 形雙渦漩紋並非如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所言是源自於鄂爾多斯的動物紋樣,而應是起源自中歐的 Hallstatt 與伊朗西部 Luristan,而 Hallstatt 文化與斯基泰的動物紋樣正是西元前九至五世紀影響中國最重要的兩個西方外來文化因素。不過值得留意的是 William Samolin 同時也意識到某些 Hallstatt 文化的黑海因素可能是源自於東亞,他強調東西方間的文化接觸並非只能是單向的。<sup>95</sup>

類似的雙渦旋紋飾在南俄西徐亞地區、新疆與中國北方地區皆有發現。在南俄西徐亞地區曾出土過一個西元前七至六世紀可能是馬具的牌飾,其上就裝飾著此類的雙渦旋紋飾(圖 46),而與之相似的雙渦旋紋飾,尚可在該區東鄰安納伊諾(Ananyino)文化的金屬飾上發現(圖 47)。類似的母題在鄰近西徐亞的高加索地區也有可比擬的例子,高加索地區約西元前十四世紀晚期青銅時代墓葬中所出土的青銅腰帶上,即裝飾著許多緊密相連的雙渦旋紋飾,應是此類紋飾的另一種發展形式(圖 48)。

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緣且末縣的扎滾魯克一號墓二期文化(春秋至西漢)出 十的木腰牌飾及木紡輪,<sup>96</sup>以及同樣位於且末的加瓦艾日克墓地 M3(春秋晚期至

<sup>93</sup> Robert von Heine-Geldern, "Some Tribal Art Styles of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 in Art History," 178-187.

<sup>94</sup> Roberto Ciarla, "A Long Debated Question: Pastoralism in South-Western China. A Different Approach," 74-75,另參羅伯特·強南(Roberto Ciarla)、墨哥里勞·奧里柯利(Marcello Orioli)著,盧智基譯,〈中國西南游牧考古爭議〉,《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5),頁186;邱茲惠,〈黑格爾 I 型銅鼓與「動物紋樣」藝術〉,《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1989.6),頁61。儘管如此,學界仍有贊同的意見,如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215-216.

<sup>95</sup> William Samolin, "Western Elements in the Art of Ch'u," 188-190, 192: 高本漢的意見參見 Bernhard Karlgren, "Huai and Ha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3 (1941): 28; Bernhard Karlgren,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 (1937): 97-112.

<sup>96</sup>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縣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 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年1期,頁115、132;新疆博物館文物隊, 〈且末縣扎滾魯克五座墓葬發掘報告〉,《新疆文物》,1998年3期,頁7。

戰國)出土的木盒上,<sup>97</sup>皆飾有明顯的雙渦旋紋飾(圖 49),另一種與高加索地區相似的連續渦旋紋飾也在扎滾魯克二號墓地(西漢時期)與加瓦艾日克墓地的木盒上有所發現(圖 50)。<sup>98</sup>對於扎滾魯克的 S 紋、渦紋飾等文化因素,邵會秋認為是來自其北方吐魯番盆地周遭的蘇貝希文化。<sup>99</sup>在中國西北,此類的紋飾最早可追溯至青海民和縣新石器晚期馬家窰文化馬廠類型的彩陶(圖 51),<sup>100</sup>同屬青海在稍晚青銅時代的大通上孫家寨卡約文化中,<sup>101</sup>也可看到此類的雙渦旋紋飾骨飾(圖 52)。在寧夏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于家莊墓地所出土的銅牌飾上,也可見到一例此類的 S 形雙渦旋紋飾(圖 53),但考古報告者認爲是一種變形的雙鳥紋。<sup>102</sup>而在中國北方地區的內蒙古林西縣井溝子遺存,也出土過類似的 S 形雙渦旋紋銅飾(圖 54),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或稍晚。<sup>103</sup>另外內蒙古地區發現的所謂「鄂爾多斯式青銅器」中,在年代爲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的某些帶扣上,同樣可觀察到此類 S 形的雙渦旋紋(圖 55)。到了漢代,此種 S 形雙渦旋紋飾在著名的蒙古諾音鳥拉匈奴墓葬中仍有發現,在諾音鳥拉墓葬 M6 中發現了一件毛製的帷幔,其上裝飾的花紋中依然可見到這種 S 形雙渦旋的圖樣(圖 56)。<sup>104</sup>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西部的岩畫之中,也曾出現過此類的 S 形雙渦旋紋樣。在西藏西

<sup>97</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縣加瓦艾日克墓地的發掘〉,《考古》,1997年9期,頁27、32。

<sup>98</sup> 新疆博物館考古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縣文物管理所,〈且末扎滾魯克二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2年1-2期,頁4、2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縣加瓦艾日克墓地的發掘〉,頁27。

<sup>99</sup> 邵會秋,〈新疆扎滾魯克文化初論〉,《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2008.12),頁180。

<sup>100</sup> 有關馬家窰文化馬廠類型的年代,約在西元前 2200-2000 年,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 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106;或是在西元前 2453-2032 年,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文物出 版社,2010),頁 620。

<sup>101</sup> 有關卡約文化的年代,依俞偉超的意見,卡約早期約在距今3800-3600年,晚期約距今3000-2600年,參見氏著,《關於「卡約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認識〉,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03;或言上限可到商代早期,下限則尚須做進一步研究。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564-566。

<sup>102</sup>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考古學報》,1995年1期,頁92-93。

<sup>103</sup> 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林西井溝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23;趙賓福認爲該遺存年在應在戰國早中期,參見氏著,〈遼西山地夏至戰國時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研究的再檢討〉,《邊疆考古研究》,第5輯(2006.12),頁57。

<sup>104</sup>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頁69 圖 49、圖版 10;魯金科(C. И. Руденко)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北京:中華書局, 2012),頁119。

部阿里地區日土縣的任姆棟岩畫(圖 57)以及康巴若久岩畫(圖 58)所描繪的鹿隻身上,都刻有 S 形雙渦旋紋,調查者對岩畫的斷代認爲是屬於吐蕃以前或吐蕃早期,<sup>105</sup>或西元二世紀以前到西元 629 年,<sup>106</sup> 呂紅亮則推測任姆棟岩畫的年代爲西元前五世紀至西元一世紀,並指出此種 S 形渦旋紋仍屬於歐亞草原藝術的動物紋風格,<sup>107</sup> 儘管衆所周知岩畫有斷代不易的缺點,然西藏的例子仍值得留意。

Sophia-Karin Psarras 認爲滇文化青銅器上的渦旋紋,要麼是純係巧合,不然就是源自於巴蜀(特別是牟托)的青銅戈,她點明有鑑於渦旋紋是一種普遍的紋飾,其出現不需要特別的解釋。不過她同時指出與東南亞的影響相比,滇文化更多的是受到來自草原,特別是匈奴及其西方更遠文化的接觸影響,S形渦旋紋的紋樣在鄂爾多斯地區也可觀察到。對於這些元素與高加索地區(喬治亞)的直接關連性,她暫時不做特別聯繫,但承認其相似性與交流的可能性,而萬家壩的鏤空錫箔飾品則暗示了與貴霜大夏的接觸,石寨山的銀碗則是來自塞琉古時代的伊朗。108 當然在考量 S 形渦旋紋問題時,絕對不能排除該紋飾是雲南當地人民獨

<sup>105</sup> 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日土縣古代岩畫調查簡報〉,《文物》,1987年2期,頁50:張建林,〈日土岩畫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2期,頁52。

<sup>106</sup>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綱》(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頁122。

<sup>107</sup> 呂紅亮,〈西喜馬拉雅岩畫歐亞草原因素再檢討〉,《考古》,2010年10期,頁76-85;另見呂紅亮,《跨喜馬拉雅的文化互動: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137-150。

<sup>108</sup> Sophia-Karin Psarras,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14-15, 26-28, 31-34。有關石寨山 的古波斯風格銀盒,有的認爲是從滇緬印道或交趾陸路傳來,參周永衛,〈南越王墓銀盒舶 來路線考〉,《考古與文物》,2004年1期,頁61-64。但有更多學者認爲是經由南越國屬地 傳入滇國的仿製品,參見孫機,《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144: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9),頁 251;霍巍,〈「西南夷」與南方絲綢之路〉,《中國文化論壇》,2008年 12月增刊,頁116;饒宗頤,〈由出土銀器論中國與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收入氏著,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十冊卷七·中外關係史》(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頁 181: 李零,〈論西辛戰國墓裂辦紋銀豆 —— 兼談我國出土的類似器物〉,《文物》,2014年9 期,頁68;謝崇安,〈雲南石寨山文化與越南東山文化的比較研究〉,《考古學集刊》,第21 期(2018.10),頁175。趙德雲認爲亦存在外來工匠在中國製造的可能性,參見氏著,〈突瓣 紋銀、銅盒三題〉、《文物》,2007年7期,頁86。喬梁則認爲這類的西方列辯紋銀盒不一定 是從海路傳入,也有可能是從北方草原之路透過匈奴的中介而傳來。參見氏著,<關於「海上 絲路 | 起始時間的探討〉,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 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520-521。郭物也有類似的見解,參見氏 著,〈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爲中心〉,頁 251。尼克魯(Lukas Nickel) 主張中國境內發現的這些伊朗風格銀盒的生產地點,可能要在中原地區來尋找,參見氏著, 《南越銀盒——異域風格的秦代銀器》,收入曹瑋、任天洛(Rehren, T.)主編,《秦時期冶金考 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91、94。杜樸(Robert Thorp)認 爲這些中國邊境諸侯王墓葬出土的波斯風格銀盒也許是來自長安漢朝皇帝的賞賜,參見Ellen

自發明的可能性,有關雲南地區 S 形渦旋紋飾的來源問題,因該區先前似無此類 S形渦旋紋傳統,再者鄰近的中國內地先秦時期亦不甚流行此類似紋飾,高本漢 曾將商周青銅器上的渦紋裝飾紋樣區分爲 C 型、T 型與 S 型,而高氏指出 S 型是 最不常見的一種。<sup>109</sup> 在秦漢之前早期中國內地的華夏文明中,S 形渦旋紋似不常 見,但在關中地區、內蒙古與河北中山國故地一帶,仍可發現這類的紋飾。關中 爲秦國故地,當地曾出土過飾有S形渦旋紋的瓦當,在秦漢時期流行的瓦當紋樣 中,主要以T型的雲紋爲大宗,但在秦代關中的雍城及咸陽(圖 59) 與戰國晚期 的內蒙古和林格爾(圖 60),卻發現部分飾有 S 形渦旋紋的瓦當。秦文化中的戎狄 特徵因素早爲學界所注意,<sup>110</sup> 關中所發現的 S 形渦旋紋瓦當應與當地戎狄文化的 渗透有關。陳永志指出 S 形雲紋瓦當在中原地區並不多見,此類瓦當在內蒙古當 地出土較多,是當地戰國時期較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種瓦當裝飾。111因此內蒙古和 林格爾瓦當上的S形渦旋紋,也當與該地屬草原文明地帶的地理環境因素脫離不 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平山縣中山國墓葬出土的文物中,發現有爲數不少 的 S 形渦旋紋飾,如該地所出土的陶製筒形器、匜、蓋豆、鼎等等,都飾有這類 的紋飾 (圖 61)。中山國爲白狄族所建,至戰國中晚期白狄雖已明顯華夏化,但該 國的戎狄文化因素仍未消失,當地文物上屢見的 S 形渦旋紋應是該國戎狄文化傳 統的一種延續。

Johnston. Laing, "Recent Finds of Western-Related Glassware, Textiles, and Metalwork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9 (1995): 17.

<sup>109</sup> Bernhard Karlgren, "Notes on the Grammer of Early Bronze Décor,"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3 (1951): 2-4.

<sup>110</sup> 杜正勝,〈秦社會的「戎狄性」〉,收入氏著,《編户齊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459-466;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大陸雜誌》,第 87 卷第 5 期(1993.11),頁 1-25;史黨社,《秦與「戎狄」文化的關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史黨社,〈多彩的邊疆——考古材料所見西元前 7-3 世紀秦之西北邊地文化〉,收入蔡慶良、張志光主編,《嬴秦溯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316-323;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考古》,2009 年 10 期,頁 70-77;梁雲,〈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 398 期(2016.5),頁 22-29;柳揚,〈秦藝術異質媒介間的互動、影響與交融〉,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503-523;Katheryn M. Linduff, "Production of Signature Artifacts for the Nomad Market in the State of Qin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4th-3rd century B.C.E.)," in 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eds. Jianjun Mei and Thilo Rerhen (London: Archetype, 2009), 90-96,以及本文註釋 194。

<sup>111</sup> 陳永志,〈内蒙古出土瓦當概論〉,收入氏編,《内蒙古出土瓦當》(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頁25。

檢討與石寨山滇文化年代相近(戰國至西漢)的幾個S形渦旋紋個案,可發 現石寨山滇文化的 S 形渦旋紋飾,在蒙古國、新疆、內蒙古、關中與河北都可 見到,故滇文化的 S 形渦旋紋可能與中國北方與西北方的內亞文化有關,甚或是 間接受到西藏西方中亞文化的影響。因此雲南石寨山滇文化中所流行的雙渦旋紋 飾,也可能一如 Robert Heine-Geldern 所指出的應是一種來自內陸歐亞的文化因 素,透過內亞系或所謂胡系族群的中介而流入中國西南地區。值得留意的是S形 雙渦旋紋很早就出現在青海,而此區也是內亞草原文化與中國文明早期接觸的區 域,如所謂的塞伊瑪-圖爾賓諾(Seima-Turbino)遺存類青銅器,最早在中國出 現的區域即在甘青地區,此點早經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指出,<sup>112</sup> 近 來梅建軍、劉翔、林梅村等人也注意到甘青地區塞伊瑪-圖爾賓諾相關遺物的問 題, 113 李旻亦提出夏代文化中有來自西北的高地龍山傳統, 而此時高地龍山社會 已與內亞發生了文化接觸,<sup>114</sup> 故內陸歐亞草原文化與早期中國的接觸,青海是個 值得留意的區域。雙渦旋紋飾有可能是沿著青藏高原東緣而進入雲南,因之雲南 與內陸歐亞之間,似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文化甚至是族群的移動與交流,才造就了 石寨山滇文化的多樣性面貌。至於其具體的交流路徑,除了童恩正的半月形地帶 說之外,可能也同時存在著其他族群與文化互動的多種交流路線。

# 四、有關内亞與希臘化文明因素如何 影響漢代雲南地區的路徑問題

內亞及希臘化文明因素爲何會出現在中國雲南的古滇國?這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而傳播是一個目前相對較有可能的解釋面向。不過提到「傳播」的概念, 有一些爭議會立刻隨之而來,譬如說西方中心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有不少

<sup>112</sup>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995): 40-52, 中譯文可參李永迪譯,〈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 收入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5-38。

<sup>113</sup> 梅建軍、高濱秀、〈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新疆文物》,2003年1期,頁47-57;劉翔、〈青海大通縣塞伊瑪——圖爾賓諾式倒勾銅矛考察與與相關研究〉,《文物》,2015年10期,頁77-85;劉翔、王輝、〈甘肅省博物館藏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調查與研究〉,《西部考古》,第14期(2017.4),頁48-58;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37-193。

<sup>114</sup> 李旻,〈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考古學報》,2017年3期,頁287-316。

學者對此一概念常是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或改用「接觸(contact)」、「互動交 流(interaction) | 等較爲含蓄的用語。<sup>115</sup>的確,傳播論在 20 世紀中期以後,因 其帶有過多推測成分,曾一度受到強烈批判而被考古學界束之高閣。但在1990年 代以後,考古學界開始反省若完全拋棄此一概念,等於是把嬰兒跟洗澡水一起倒 掉。此後考古學界重新檢討材料後發現,在很多的情況下,人群遷徙仍是解釋某 一地區文化變化的唯一有效概念。考古學家呼籲在解釋考古學文化變遷時,應特 別注意人口的數量、結構與人群移動往往會對文化傳遞造成影響,而人群的遷徙 與擴張,也被視爲是農業傳播的重要因素。116近年來學界已重新評估人類在史前 時期的長距離移動能力,學者發現遠自史前時期開始,人類即已經常實踐長距離 的移動與物資交流。<sup>117</sup> 即便進入歷史時期,非洲與歐亞大陸上的人群長距離交流 與互動依然非常活絡,<sup>118</sup>長距離的民族移徙並非不可能。<sup>119</sup>尤其考古學界現在也 非常重視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謂「世界體系」概念在考古學上的 應用,並主張自遠古時期開始,長距離貿易的世界體系在近東至少有五千年的歷 史。<sup>120</sup> 因之以往有些被認爲獨立發展的文化因素現在已重新被考慮是接觸及交流 下的產物,如東南亞的稻作與青銅冶金起源即是一例,現在考古學家已經越來越 傾向認爲這是長距離文化接觸交流的影響,而非完全是當地的獨立起源。121 因此

<sup>115</sup> 有關傳播論的爭議討論,參見 Anke Hein, "Diffusionism, Migration,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Border Region," in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aterial concern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ed. Anke Hein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1-17.

<sup>116</sup> 焦天龍,《中國考古學概念的反思》,頁 134-137。

<sup>117</sup> Peter N. Peregrine, Ilia Peiros, and Marcus Feldman ed., *Ancient Human Migr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9); Peter Bellwood ed., *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15).

<sup>118</sup> Victor H. Mair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特別是晚期鐵器時代歐亞大陸上的長距離文化互動可參 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s. Jan Bemmann & Michael Schmauder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199-332.

<sup>119</sup> Anke Hein, "Metal, Salt, and Horse Skulls: Elite-Level Exchange and Long-Distance Human Movement in Prehistoric Yanyua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aterial concern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ed. Anke Hein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89-108.

<sup>120</sup> 焦天龍,《中國考古學概念的反思》,頁107-110。

<sup>121</sup> Sing C. Chew, The Southeast Asia Connection: Trade and Polities in the Eurasian World Economy,

以現今考古學的眼光來看,「傳播」並非是一個應完全被摒斥的解釋概念。

不過若要論到文化傳播,就必須解決所謂中間「失落環節(Missing Link)」的問題,也就是說必須找到介於內亞與雲南之間地帶的中介證據。顯然在希臘化與斯基泰因素爲何出現在雲南的這個議題上,目前還找不到中間的傳播環節點。<sup>122</sup>但是兩者之間強烈的相似性,還是令人不由得懷疑這可能是文化接觸甚至是族群移動的結果,所以討論其間可能的聯絡途徑,可以讓我們重新去思考古代中國西南與內陸歐亞文化之間複雜的文化滲透與交流關係。

如同 Sophia-Karin Psarras 指出的,古代中國西南地區的外來物質文明有三大源頭,即中國、草原與越南東山文化。<sup>123</sup> 有關內亞文化因素如何進入雲南地區?格勒認爲無非是以下三種情況:一是透過所謂「胡系」民族直接南下入滇;二是通過第三者或中間民族傳播文化;三是通過雙方的文化交流而傳播。<sup>124</sup> 至於內亞及希臘化文明如何傳入雲南地區的路線問題,學界有不同見解。總體說來,溝通內亞與雲南的聯繫管道大體有以下四條可能路徑:一是透過童氏主張的半月形傳播帶,經過藏彝走廊進入雲南;二是透過新疆從青藏高原北綠南下而至雲南;三是學界也已非常熟悉的所謂「滇身毒道」,即通過緬甸經印度而通中亞;四是透過克什米爾,經藏南一線而直接傳入雲南,這是學界相對關注較少的一條路線。但不論何種路線,目前都僅止於是一種推測,當然本文需再次強調絕不能排除這也許是雲南當地文化獨立發展的結果。

首先是半月形傳播帶路線。一如前述,有關雲南地區與北方草原地區的聯繫,童恩正的半月形傳播帶一直是學界最有影響力的一種解釋,特別是透過青藏高原東緣的「藏彝走廊」,此爲學界早已熟知的路徑,如杜正勝即認爲雲南滇文化的鬥獸青銅器有可能是沿甘肅青海四川西部而南下的。<sup>125</sup> 也有學者主張藏彝走廊上所發現的若干西亞文化因素,如帶柄銅鏡、料珠玻璃或石質珠等,都是透過南

<sup>500</sup> B.C.-A.D. 5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8), 23-39.

<sup>122</sup> 段渝曾嘗試用「文化飛地」的概念,來解釋爲何古蜀地由印巴次大陸傳入青銅雕像與權杖等 文化因素,但卻未在雲南留下任何痕跡。參見氏著,〈中國西南早期對外交通——先秦兩漢的 南方絲綢之路〉,《歷史研究》,2009年1期,頁17。

<sup>123</sup> Sophia-Karin Psarras,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8.

<sup>124</sup> 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頁493。

<sup>125</sup>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2分(1993.6),頁359。

遷的氐羌族群,從中亞、新疆沿藏彝走廊傳到西藏、四川及雲南。<sup>126</sup>的確在兩漢時期,羌人與匈奴之間一向不乏聯繫,以張騫(?-114 B.C.)的遭遇而言,他在從中亞回國的過程中爲避免再度遭匈奴截獲,所以選擇了原先認爲相對安全的「羌中道」,未料還是被羌人擴獲直接送往匈奴,<sup>127</sup> 故青藏高原與北方草原間往來的密切性自然不言可喻。至於雲南石寨山出土文物的內亞因素,究係是透過間接傳播,或是由某一內亞系游牧民族因遷徙而直接傳播的問題,長期以來都是學界討論的焦點。如邱茲惠認爲在西元前後,某些起源於歐亞大漠的游牧民族已遷徙到中國西南,並創造了石棺葬文化,這些遷徙至中國西南的民族仍與中亞民族保持著聯繫,並在其文化發展中保留了游牧民族的風格。<sup>128</sup> 楊建華於 2010 年時亦提出中國西北地區所流行的三叉式護手劍,至遲在西漢甚至是戰國晚期即已傳至中國西南的洱海地區。<sup>129</sup> 霍巍指出約在西元前五至三世紀,由於匈奴的入侵,使原居於甘青的氐羌系民族或被匈奴征服,或流離失散,其中一部份很可能沿著橫斷山派河谷地帶南遷至西南地區,在漢晉時期,與岷江上游相接的西北地區已有大量的「胡系民族」存在。<sup>130</sup> 凡此都是強調中國西南與北方草原地帶間的密切聯繫,二者之間存有文化擴散甚至是族群遷徙的關係。

秦穆公稱霸西戎後,隨著西戎的南遷和東遷,也將中國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帶入了青藏高原的東緣地區和關中。<sup>131</sup> 其實在另一方面,歐亞草原地帶及阿爾泰的文化因素也同時從河西走廊的西北一線南下至青藏高原的東緣。<sup>132</sup> 以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特別是馬家塬文化)爲例,他們除吸收中國北方草原文化之外,同時也吸收了來自西北方阿爾泰及更西方的歐亞草原因素。<sup>133</sup> 石寨山的馬匹裝飾有來

<sup>126</sup> 申旭,〈藏彝民族走廊與西亞文化〉,《西藏研究》,2000年2期,頁71-79。

<sup>127《</sup>史記·大宛列傳》云張騫在中亞「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59。

<sup>128</sup> 邱茲惠,〈黑格爾 I 型銅鼓與「動物紋樣」藝術〉,頁 63-64。

<sup>129</sup> 楊建華,〈三叉式護手劍與中國西部文化交流的過程〉,頁71-78。

<sup>130</sup> 霍巍,〈論橫斷山脈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藏學學刊》,第2輯 (2005.6),頁167-169。

<sup>131</sup> 王輝,〈近年來戰國時期西戎考古學文化的新發現與新認識〉,收入蔡慶良、張志光主編,《嬴秦溯源》(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333。

<sup>132</sup> 如卡約文化的動物紋飾便同時受到這兩方面文化的影響,參張文立,〈卡約文化銅器動物紋初探〉,《草原文物》,2016年2期,頁84-92。

<sup>133</sup> Yang Liu, "Nomadic Influences in Qin Gold," *Orientations* 44.2 (2013): 1-7; Alain Thote, "Defining Qin Artistic Traditions: Heritage, Borrowing, and Innovation," in *Beyond the First Emperor's* 

自阿爾泰的影響, $^{134}$  而雲南當地早期的冶銅技術也與歐亞草原冶金傳統有關。 $^{135}$  因之此一文化傳播與互動的路線形狀,可能不是半月形而是以青藏高原的東緣爲中心線的 Y 字型(圖 62)。近來郭物進一步提出所謂「X 形邊地傳播帶」的概念,也是值得留意的一種新說。 $^{136}$ 

接著是有關內亞與中亞希臘化因素是否經過新疆中介後,再從青藏高原北綠南下而與雲南接觸的路徑問題。張騫通西域以前中國是否曾與希臘化文明發生過接觸?近來因兵馬俑是否曾受希臘化文明影響的問題而引起了關注,<sup>137</sup>但目前對此尚無明確的直接證據,然有跡象表明在冶金技術方面中國曾與西亞有過交流。<sup>138</sup>另一個相關討論是貴霜王朝的統治勢力是否曾擴及新疆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爲佉盧文在新疆的流行,是貴霜勢力擴及中國的證明:<sup>139</sup>但也有人反對這種看法,認爲

Mausoleum: New Perspectives on Qin Art, ed. Liu Yang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2014), 20-24; Jenny F. So, "Foreign/Eurasian Eements in Pre-imperial Qin Culture: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Types," in Beyond the First Emperor's Mausoleum: New Perspectives on Qin Art, ed. Liu Yang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2014), 206-207; Wan Hui,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the Majiayuan Cemetery and Qin's Interaction with Steppe Cultures," in Beyond the First Emperor's Mausoleum: New Perspectives on Qin Art, ed. Liu Yang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2014), 212-239; 吴晓筠,〈山巅上的雄鹿、猛虎與野山羊:馬家塬馬車草原装飾的來源與傳播途徑〉,《故宮學術季刊》,第 34 卷 1 期(2016.9),頁 1-51;邢義田,〈秦漢中國與域外世界〉,收入孫志新主編,劉鳴、徐暢譯,《秦漢文明——歷史、藝術與物質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111:柳楊,〈馬家塬出土金銀器銅飾動物造型的歐亞草原游牧文化因素〉,收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秦與戎——秦文化與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頁 24-70。

- 134 Karen S. Rubinson, "The Authority of Horse-Rider Iconography: Imagery as the Power of the Past (The Eurasian Steppe and Yunnan in the late Millennium B.C.E.)," in *How Objects Tell Stories: Essays in Honor of Emma C. Bunker*, eds. Katheryn M. Linduff & Karen S. Rubinson (Turnhout: Brepols, 2018), 141.
- 135 TzeHuey Chiou-Peng, "Early Copper-base Metals in Western Yunnan," in *How Objects Tell Stories: Essays in Honor of Emma C. Bunker*, eds. Katheryn M. Linduff & Karen S. Rubinson (Turnhout: Brepols, 2018), 162.
- 136 郭物的理論主要主張北方草原文化到達雲南後,還進一步朝東南傳向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另一方面再從西南綠路通至印度,此即爲其所謂的「X 形邊地傳播帶」。對於北方草原文化是否在華南及越南傳播甚至同時也透過雲南再朝印度傳播一事,個人認爲目前在華南部分有一些證據,但在往印度方向證據尚嫌薄弱,而此點是郭物自己在文中也承認的。參氏著,〈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爲中心〉,頁 256-259。
- 137 Lukas Nickel,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2013), 413-447: 段清波,〈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西北大學學報》,第45卷第1期(2015.1),頁8-15;格爾曼·漢夫勒著,侯改玲、申娟譯,〈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臨潼兵馬俑觀感〉,《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1年第1期,頁23-27。
- 138 Jenny F. So, "Foreign/Eurasian Eements in Pre-imperial Qin Culture: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Types," 193-211: 段清波,〈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 (一)〉, 頁 13。
- 139 John Brough, "A Kharost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貴霜勢力從未到達過新疆,且《後漢書·班超傳》明確記載班超(32-102)曾成功擊退大月氏副王謝企圖進入新疆的部隊:<sup>140</sup>還有一種看法認爲自東漢末年起,曾有一批大月氏人因避難而陸續流寓至新疆塔里木盆地。<sup>141</sup>其實考古學者早已提出在古代同時存在的政治中心之間,貿易往來既可是直接的,也可是間接的,物質文化以及青銅冶鑄等「高科技」知識很可能會在較大區域內自由地傳播,因之物質文化的擴散,不代表在大區域中存在著某一政治或經濟上的中心,並向外伸展霸權,<sup>142</sup>因此貴霜是否統治過新疆,從考古物質文化上來看並無太大的意義。不過就《後漢書》的記載來看,貴霜確曾介入過新疆綠洲諸國的政治,《後漢書·西域傳》即記載了(大)月氏干預當時疏勒國王位繼承紛爭的情況: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稟城侯。143

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國西南地區在漢代曾透過新疆、青藏高原北緣中介而接觸到希臘化文明的可能性。葛樂耐(Frantz Grenet)認為西遷的大月氏在五翕侯時期,仍與甘肅的故土保有聯繫,甚至透過這種聯繫管道向中國漢廷派出使節,<sup>144</sup>因之中國西北與中亞大月氏之間的溝通管道似未完全中斷。《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裴注

Studies 24.3 (1961): 517-530; John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3 (1965): 582-612;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ska," in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 Submit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Date of Kaniska. London, 20-22 April, 1960.*, ed. A. L. Basham (Leiden: E. J. Brill, 1968), 247-258; Douglas A. Hitch, "Kushan Tarim Dominatio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2.3/4 (1988): 170-192.

- 140 莫任南,〈東漢和貴霜關係史上的兩個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2期,頁67-74;王炳華, 〈貴霜王朝與古代新疆〉,《西域研究》,1991年1期,頁35-38;孟凡人,〈貴霜統治鄯善之說 純屬虛構〉,《西域研究》,1991年2期,頁29-39。
- 141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2期,頁18-28: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收入氏著,《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33-67;陳曉露,〈樓蘭壁畫墓所見貴霜文化因素〉,《考古與文物》,2012年2期,頁79-88;陳曉露,〈塔里木盆地的貴霜大月氏人〉,《邊疆考古研究》,第19輯(2016.6),頁207-221。
- 142 林永昌,〈東山文化的若干問題再檢討〉,頁 129-130。
- 143 (劉宋) 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88,〈西域傳〉,頁2927。
- 144 Frantz Grenet, "The Nomadic Element in the Kushan Empire (1st-3rd century A.D.)," 7.

引《諸葛亮集》云:「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sup>145</sup>馬雍認爲此處所提及之支富、康植等人是當時僑居於于闐、鄯善之中亞移民,<sup>146</sup>甚或是流亡的貴霜貴族,蜀國只可能通過青海和柴達木地區與西域取得聯繫,<sup>147</sup>不過也有人認爲《諸葛亮集》所提及的這些西域中亞移民有不少其實是粟特商胡。<sup>148</sup>看來青海道與中亞的交通路線在東漢末年尚溝通無礙,然在西漢之前此路徑的交通情況較不明朗,但當地有不小月氏人還在附近活動,一如葛樂耐所言他們與中亞的大月氏不排除還有聯繫,因此雲南地區藉由青海道而接觸到中亞希臘化文明的某些文化因素,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再來第三種是常被提起的「滇身毒道」,即中亞的文化因素可透過印度東北阿薩姆一帶而傳入中國雲南,這條路線以往學界通稱爲「南方絲綢之路」或「西南絲綢之路」(圖 63)。<sup>149</sup> 余英時指出從張騫於西元前 122 年提及中亞大夏邛杖蜀布的報告,已證實了漢朝時期著名的印度-緬甸-雲南陸上貿易通道的存在,<sup>150</sup> 張增祺進一步指出此路線應由雲南騰衝一帶過伊洛瓦底江,至緬甸北部的孟拱,再渡親敦江到達印度東北的英帕爾,然後沿恆河流域轉入印度西北與伊朗高原相接的坦叉始羅(即白沙瓦附近)轉向西行,與「絲綢之路」相接。<sup>151</sup> 段渝更補充此路線到永昌郡時尚可再分出海路一線,即沿伊洛瓦底江至下緬甸出海,航行於孟加拉灣後在金州(Khersonese)登陸,此爲與羅馬進行絲綢、黃金和寶石貿易的主要商業路線。<sup>152</sup> 任乃強則將這條從大理渡瀾滄、潞江之後經騰衝入上緬甸,經密支那至印東阿薩密,再由中印度、北印度、巴基斯坦至阿富汗的貿易路線稱

<sup>145 (</sup>西晉) 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33,〈蜀書·後主傳第三〉, 頁 895。

<sup>146</sup>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頁 26-27。

<sup>147</sup> 馬雍,〈古代鄯善、于闖地區佉盧文字資料綜考〉,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85-86。

<sup>148</sup> 林梅村,〈漢代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北方民族考古》,第3輯(2016.9),頁201。

<sup>149</sup>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頁 234。

<sup>150</sup> 余英時著, 鄒文玲等譯, 《漢代貿易與擴張》(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頁 97。但工藤元男曾以蠶種西傳爲例, 認爲不能排除邛杖蜀布也可能是透過西域南道的于闖而販售至中亞大夏地區, 參見氏著, 〈蜀布と邛竹杖〉,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 第 47 輯 4 分冊 (2001.2), 頁 90-92。

<sup>151</sup> 張增祺,〈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池區域發現的西亞文物〉,《思想戰線》,1982年2期,頁82。

<sup>152</sup> 段渝,〈南方絲綢之路:中——印交通與文化走廊〉,《思想戰線》,2015年6期,頁93。

爲「蜀布之路」。<sup>153</sup>據《華陽國志·南中志》的記載,「永昌郡,……明帝乃置郡。 屬縣八。户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僄越、躶 濮、身毒之民」,<sup>154</sup>身毒之民指的就是印度人,<sup>155</sup>說明東漢明帝時在永昌郡的人 口中,當時已有印度人。饒宗頤曾進一步指出依《華陽國志·南中志》「身毒國, 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的說法,<sup>156</sup>認爲永昌在當時已被常璩視爲身毒,<sup>157</sup>足見 印度當時與雲南已有相當之往來。此條路線以往因史料匱乏而無法在文獻上找出 積極的證據,對於這條古代中緬之間的商道存在與否,學界曾有懷疑的意見,<sup>158</sup>對 此童恩正持肯定的態度,但他強調兩者之間的交通運輸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sup>159</sup> 伯希和(Paul Pelliot)認爲東漢明帝時印度佛僧(攝)摩騰與(竺)法蘭即是透過 緬甸、雲南一路而至中國。<sup>160</sup> 稍晚東漢安帝時亦曾有來自西方大秦的幻人經由西 南地區撣國進入中國內地,<sup>161</sup>《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

永寧元年 (120A.D.), 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 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 自支解, 易牛馬頭。又善跳丸, 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 撣國西南通大秦。<sup>162</sup>

葛劍雄認爲從大秦(羅馬)的雜技演員能夠到達撣國,是這條「身毒道」道路通

<sup>153</sup> 任乃強,〈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雜誌》,1987年1期,頁36。

<sup>154 (</sup>東晉) 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285。

<sup>155</sup> 季羡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收入氏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228。

<sup>156 (</sup>東晉) 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頁 230。

<sup>157</sup> 饒宗頤,〈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4分(1974.6),頁562、576。但劉琳懷疑常璩此說有誤,或字有訛脱,參氏著,《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頁341:任乃強後來於永昌後逕補「徼外」二字,認爲原文應爲「今永昌徽外是也」,參見(東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頁230。

<sup>158</sup> 夏鼐,〈中巴友誼的歷史〉,《考古》,1965年7期,頁362 註釋2。相關的討論可參見楊斌 (Yang Bin)著,韓翔中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臺北:八旗文化, 2021),頁69-81。

<sup>159</sup> 童恩正,〈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頁85。

<sup>160</sup>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頁 10-11。

<sup>161</sup> 撣國一般以爲即今緬甸之南北撣邦,參見芮逸夫,〈僰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上(1951.12),頁276。

<sup>162 (</sup>劉宋) 范曄,《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頁2851。

#### 暢、人員和貨物交流頻繁的證明。163

雲南緊鄰中南半島,透過中南半島接觸到印度西北的希臘化貴霜文化,確實極有可能。有關中亞與東南亞的古代交通,近來一些中南半島的考古發現已證實在西元前後的兩漢時期,中南半島的確與來自西亞或中亞的羅馬一希臘化國家存在著貿易交通往來。在泰國南部與位於湄公河下游三角洲的柬埔寨、越南一帶,陸續出土了來自西亞與中亞的玻璃、珠寶與羅馬錢幣等羅馬一希臘化時代的文物,這些遺存同時也有漢代遺物伴隨出土,證實了中南半島與西亞、中亞、中國曾存在過不少的貿易往來。其中考古學家特別留意到某些金屬器物的特徵顯然是來自希臘化與後希臘化時期的中亞大夏地區,說明了該區透過與中亞貴霜等國家的接觸而受到希臘化文明影響的可能性,來自中亞大夏的希臘化文明素可能透過印度的中介而傳入東南亞。<sup>164</sup> 邦克也認爲商人可從滇國往西到達印度,在那裡與中亞與西北亞的商人們進行進行貿易交往,<sup>165</sup> 足見此一從中亞經印度而進入西南中國的交通路線在漢代確實存在,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四個可以留意的早期雲南-中亞聯繫路徑,是透過西藏地區而直接抵達雲南。季羨林先前在討論古代中國與印度間的交通路線時,早已提出有「西藏道」這條路線,<sup>166</sup> 既然經西藏可以通印度,自然中亞的文化元素也可透過印度而輸入中國西南。童恩正也點出西藏早期金屬器時代考古中的石丘墓、大石遺跡及動物形紋飾三者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徵。<sup>167</sup> 其實溝通中亞與雲南的道路尚有一條以往學界較爲忽視的路線,即是從中亞帕米爾高原出發,途經喀什米爾而直接通過藏南地區來到雲南,這條路線或許可稱爲「西藏南道」,以有別於另一條從藏北青海一帶進入中國的所謂「青海道」。早在二戰之前,杜齊(G. Tucci)已在西

<sup>163</sup> 葛劍雄,《關於古代西南交通的幾個問題》,收入段渝主編,《南方絲綢之路研究論集》(成都: 巴蜀書社,2008),頁157。

<sup>164</sup> Sergey Lapteff, "On Post-Hellenistic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New Materials Recently Found in Southern Thailand and around Tonle Sap Lake in Cambodia,"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2 (2016): 295-320.

<sup>165</sup> Emma C. Bunker 著,趙永勤譯,〈滇國藝術中的「動物格鬥」和騎馬獵手〉,頁 131。

<sup>166</sup> 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頁217、225-226;桑秀雲也同樣認爲有此條 透過西藏通印度的蜀印交通路線,參見氏著,〈蜀布邛竹傳至大夏路徑的蠡測〉,《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1分(1969.3),頁74-75。

<sup>167</sup> 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文物》,1985年9期,頁14-15。

藏西部一帶發現過一些帶有「草原」或「動物」風格的小型青銅器,<sup>168</sup> 他指出西藏地區與中亞草原的藝術一直存有聯繫,不論這種聯繫是直接或間接的。他還提到 Goldman 的研究發現西藏(特別是藏西)與伊朗文化之間的聯繫亦復如此,而這可能是遷徙或貿易的結果。<sup>169</sup> 布薩格里(Mario Bussagli)針對杜齊在藏西發現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他除點出這些遺物與歐亞草原藝術間的關係外,也指出這遺物與中國、印度、伊朗、美索不達米亞、埃及、高加索、南西伯利亞、內外蒙古等地區的發現遺物都可以找到聯繫。<sup>170</sup> 2000 年位於西藏拉薩南方浪卡子縣距今約二千年前左右的查加溝墓地,也發現了一些具有北方草原動物紋飾風格的馬形牌飾,考古報告者認爲這暗示著西藏與古代北方文化之間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聯繫。<sup>171</sup>

西藏是亞洲古文明的薈萃之所,<sup>172</sup> 霍巍指出早在西藏「早期金屬時代」,甚至從新石器時代開始,西藏高原各地(甚至是藏地極西)通過藏東橫斷山脈與四川西北、滇西北高原等族群間,已經存在某種交流管道,或是通過冶金術的傳播、或是通過器物之間的交換,都顯示西南山地與西藏高原之間,從青銅時代到早期鐵器時代已有密切的關係,<sup>173</sup> 西藏早期金屬器時代的各部族已經具備長距離交流的能力,不論這種交換行爲是直接或間接的。<sup>174</sup>

有關這條自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中亞-帕米爾-西藏的古代東西交通 孔道,有學者名之爲「吐蕃絲綢之路」或「高原絲綢之路」, <sup>175</sup> 近年來已越來越受 學界重視。<sup>176</sup> 在時代稍晚的吐蕃時代,西藏與中亞的交通管道,有從勃律繞道蔥

<sup>168</sup> Giuseppe Tucci, "On Some Bronze Objects Discovered in Western Tibet," Artibus Asiae 5. 2/4 (1935): 105-116.

<sup>169</sup> Giuseppe Tucci, Transhimalaya, trans. James Hogarth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73), 34.

<sup>170</sup> Mario Bussagli, "Bronze Objects Collected by Prof. G. Tucci in Tibet: A Short Survey of Religious and Magic Symbolism," Artibus Asiae 12.4 (1949): 331-347.

<sup>171</sup> 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文物局,〈西藏浪卡子縣查加溝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6期, 頁45-47: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173-187。

<sup>172</sup> 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頁9。

<sup>173</sup> 霍巍,〈論西藏發現的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考古學報》,2014年3期,頁343;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問題的思考〉,《中國藏學》,2018年2期,頁10。

<sup>174</sup> 霍巍,〈從考古發現看西藏史前的交通與貿易〉,《中國藏學》,2013年2期,頁11。

<sup>175</sup> 張雲,《絲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35;霍川、霍巍,〈漢晉時期藏西「高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及其歷史意義〉,《西藏大學學報》,2017年1期,頁52-57。

<sup>176</sup> 相關研究可參考霍巍,《「高原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及其歷史意義》,《社會科學家》,2017

嶺進入西域的勃律道,以及經象雄(羊同)、過迦濕彌羅而進入中天竺的路線,西藏西部可越過喀喇昆侖山口而至印度、巴基斯坦和喀什米爾,向北則可直通帕米爾高原抵達蔥嶺之西。<sup>177</sup> 譬如西藏的帶柄銅鏡極可能就是從中亞透過塔里木盆地西南緣而傳入西藏西部,再透過青藏高原沿橫斷山脈河谷進入到四川西北與滇西地區,<sup>178</sup> 也可能直接自中亞南部或印度北部經西藏西部傳入,<sup>179</sup> 而西藏的蝕花料珠可能來自西北地區、中亞甚至伊朗。<sup>180</sup> 西藏西部發現的黃金面具也應與中亞、新疆的古代歐亞大陸民族和文化交流有關,<sup>181</sup> 黃金面具的使用和傳播可能與印歐人的活動和遷徙相關。<sup>182</sup> 呂紅亮的研究指出來自中亞的塞人可能在西元前第一千紀中葉即已侵入喜馬拉雅西北部山區,進入印度河北部而對西藏阿里一帶的青銅文明產生影響。<sup>183</sup> 仝濤認爲喜馬拉雅地帶在早期鐵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即與新疆和南亞次大陸的關係非常密切,又通過新疆與中原、中亞和歐亞草原存在互動與交流,青藏高原的交通並非一般認爲的那樣阻塞不通。<sup>184</sup> 也有學者指出西藏的天葬與苯教,<sup>185</sup> 其實有受到來自波斯拜火教影響的跡象。文化交流同時也是雙

年11 期,頁19-24;霍巍,〈論橫斷山脈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頁155-169;霍川、霍巍,〈漢晉時期藏西「高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及其歷史意義〉,頁52-57;霍巍,〈論西藏發現的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頁79-87;霍巍,〈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關係〉,《北方民族考古》,第2輯(2015.8),頁103-121;呂紅亮,〈西喜馬拉雅地區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15年1期,頁1-34;呂紅亮,〈西喜馬拉雅岩畫歐亞草原因素再檢討〉,頁76-85;仝濤、李林輝,〈歐亞視野內的喜馬拉雅黃金面具〉,《考古》,2015年2期,頁92-102;仝濤,〈論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晉墓出土銀壺的異域風格〉,《考古》,2009年5期,頁70-79;Tao Tong, The Silk Roads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Oxford: Archaeopress, 2013).

- 177 霍巍,〈從考古材料看吐蕃與中亞、西亞的古代交通〉,《中國藏學》,1995 年 4 期, 頁 51、53。
- 178 霍巍,〈論橫斷山脈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頁 164。
- 179 霍巍、王煜、呂紅亮,《考古發現與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5),頁 228。
- 180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306-307;呂紅亮,〈中國境內出土的蝕花石珠述論〉,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編,《長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146-175;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頁15。
- 181 霍巍,〈論西藏發現的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頁347-348;霍巍,〈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關係〉,頁108-109、112。
- 182 仝濤、李林輝、〈歐亞視野内的喜馬拉雅黃金面具〉,頁99。
- 183 吕紅亮,《跨喜馬拉雅的文化互動: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頁119-121、169-170、175。
- 184 仝濤、李林輝、〈歐亞視野内的喜馬拉雅黃金面具〉,頁 100-101。
- 185 霍巍,〈西藏天葬風俗起辨析〉,《民族研究》,1990年5期,頁39-46;張雲,《絲路文化·吐蕃卷》,頁241-243;張雲,〈本教古史傳說與波斯祆教的影響〉,《中國藏學》,1998年4期,頁70-80;另參氏著,《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112-245。

向的,韓建業的研究表明中國西北甘青一帶的彩陶早在距今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即已沿著喜馬拉雅山南綠往西影響至克什米爾地區,顯示中國早在絲綢之路成形之前,即存在著一條長距離東西文化滲透的「彩陶之路」。<sup>186</sup>

近來針對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木墓地西元三至四世紀古代人群的古 DNA 研究也表明,其母系的單倍型類群雖主要是歐亞東部類群,但也有少量屬於歐亞西部歐羅巴單倍型類群,說明西藏古代人群與周邊人群存在著基因的交流,西藏古代居民幾千年來並不是「孤獨」地進化。<sup>187</sup> 足見西藏自古即可透過現今的喀什米爾地區與中亞產生交流,故雲南透過西藏獲得來自中亞的某些希臘化文明因素,也是值得學界注意的一個交通管道。因印度本身很早就受到希臘化文明的影響,所以印度應可視爲是其中的一個中介環節點,而西藏又緊鄰印度(特別是喀什米爾),故雲南滇國透過印度或西藏而吸收到希臘化的文明因素,應在可料想的範圍之中。就目前的情況推估,個人認爲經印度與西藏而到雲南的路線,也許是可能性較大的兩種路徑,但仍不能排除從新疆或西北一線進入雲南的可能。

有關 S 形雙渦旋紋的問題,有鑑於 S 形是一種相當常見的紋飾,當然不能排除是雲南當地古代族群的獨立發明。但此種紋飾也有極大的可能是與內陸歐亞有關,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雙渦漩紋主要還是流行於內亞地區,因爲石寨山文化中有一定數量的內亞文化元素,且 S 形雙渦旋紋並非是該區唯一與內亞有關的單一因子,因此其從內亞流布到雲南,甚至直至中南半島的東山文化,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可能性。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是有關中南半島冶金術起源的討論,Joyce C.White 曾經提出中南半島青銅冶金術的起源,極可能是透過黃河上游青藏高原東緣齊家文化的中介,而將歐亞冶金區(Eurasian Metallurgical Province)的塞伊瑪一圖爾賓諾冶金術以快速擴張模式由南西伯利亞傳至中南半島。<sup>188</sup> 因此雲南 S 形雙渦旋紋的問題就目前看來,還是不能忽視來自內陸歐亞的強烈影響。

<sup>186</sup> 韓建業,〈「彩陶之路」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與文物》,2013年1期,頁28-37。

<sup>187</sup> 張雅軍等,〈從頭骨形態學和古 DNA 探究公元 3-4 世紀西藏阿里地區人群的來源〉,《人類學學報》, 2020 年 3 期, 頁 447。

<sup>188</sup> Joyce C. White & Elizabeth G. Hamilton,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2.4 (2009): 357-397; 中譯文可參陳瑋譯,〈東南亞青銅技術起源新論〉,《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5),頁 59-112。

#### 五、結論

經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雲南以石寨山爲代表的早期滇文化中,其實 反映了不少內陸歐亞的文化因素,特別是斯基泰的文化因素,此一現象早已爲學 界所認知。本文進一步指出在某些服裝與武器上,滇文化與斯基泰-塞種人有著 高度的一致性,如身著緊身帶圓點狀或菱形狀圖案的斯基泰窄袖褲裝,與頭戴塞 種人常見的高聳尖帽,在某些武士的頭盔與鎧甲上,還出現了中亞的希臘化文明 特徵。而另一個疑似內亞的文化特徵,是廣泛在滇文化出現的 S 形雙渦漩紋飾, 這種紋飾是一種具有內陸歐亞特色的紋樣,曾廣泛流行於中歐、巴爾幹半島、東 歐、高加索、南俄、中亞烏茲別克、新疆、內外蒙古、寧夏、青海、西藏等地, 可能沿著青藏高原的東緣也南下流行至雲南地區,甚至來到中南半島。可以看 到,早期內亞系統的北方族群與文化自很早的時期開始,便沿著青藏高原周緣一 線滲入了中國的西南邊境地區,這種草原與青藏高原周邊地帶的文化與族群互動 交流,可能自月氏尚未西遷前的先秦時代早已開始。<sup>189</sup> 霍古達(Gustav Haloun) 懷疑西周末年宣王發動對玁狁的進攻,是造成中亞民族大移動的原因,而西史上 所謂的 Cimmerians 可能即是中國北方的玁狁, 190 圖齊認爲有關在藏北及西藏東北 部一帶延續許多世紀至今仍可觀察到的草原藝術,對此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月氏在 該區遷徙活動的影響。191 羅列赫(G. N. Roerich)氏亦將藏北牧民至今仍使用與 斯基泰藝術相近的動物紋樣之原因, 192 歸諸於是來自屬於伊朗人的月氏在漢代退 入南山後所造成的歷史影響。193 白鳥芳郎表示在四川與雲南,除了有羌族的居住 外,可以推測至少有月氏、烏孫或是塞種與羌族交錯雜居。<sup>194</sup> 郭物認爲塞人或巴

<sup>189</sup> 如陳洪等人認爲西南地區的屈肢葬與秦人的屈肢葬都是受到西北地區寺洼、辛店文化等羌戎部族的影響。參見陳洪、武麗娜、李宇、聶莉,〈秦人屈肢葬與西南地區的屈肢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總5輯(2015.10),頁176-183。

<sup>190</sup>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ï-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91.2 (1937): 317-318.

<sup>191</sup> Giuseppe Tucci, *Transhimalaya*, trans. James Hogarth, 34-35.

<sup>192</sup> 有關夥爾巴人的北方草原葬俗與使用的動物文樣,可參考 George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 Tribe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30).

<sup>193</sup> George N. Roerich, *Trails to Inmost Asia: Five Years of Exploration with the Roeric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367-368.

<sup>194</sup> 白鳥芳郎,〈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スキタイ系文化の影響——種族=民族の交流とその經路〉,頁 211-212:白鳥芳郎著,朱桂昌譯,〈石寨山文化的擔承者——中國西南地區所見斯基泰文化的影響〉,頁 64。

澤雷克文化的人群很容易可以順著阿爾泰山、蒙古草原或從塔里木盆地南緣的昆侖山進入甘青,沿著藏彝走廊而進入雲貴高原。<sup>195</sup> 劉文鎖曾指出:月氏人或與其相關的游牧文明在河西走廊與天山東部地區活動期間,其範圍可能即已沿著青藏高原東緣達到四川西部和雲南西部等地。<sup>196</sup> 翟國強也有相同的見解,認為滇文化的印歐人種應與小月氏人有關。<sup>197</sup> 個人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小月氏的角色的確相當值得思考,有不少學者認為月氏是屬於斯基泰一塞種系統的游牧民族,他們的後裔在漢代是否曾進入到中國雲南地區,是個值得繼續探索的問題。目前學界對所謂「青海道」與「藏彝走廊」地帶已展開了積極的研究探索,相信會有更多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來協助釐清早期發生在這一區域的民族與文化交流歷程。

<sup>195</sup> 郭物,〈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爲中心〉,頁255。

<sup>196</sup> 劉文鎖,〈漢代「胡人」圖像補說〉,收入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委會編,《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492。

<sup>197</sup> 翟國強,〈滇文化與北方地區文化及族群關係研究〉,頁84-86。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劉宋) 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
- (西晉) 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東晉) 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
- (東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Herodotus 著,王以鑄譯,《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 近代論書

#### 1. 專書

- В.И. 庫濟辛 (В. И. Кузищина) 主編,甄修鈺、張克勤等譯,《古希臘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林西井溝子》,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 史黨社,《秦與「戎狄」文化的關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 社,2014。
-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巴里·鮑威爾(Barry B. Powell)著,陳恒等譯,《希臘人:歷史、文化和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二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
- 伯希和(Paul Pelliot)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 余太山,《貴霜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余英時著, 鄔文玲等譯, 《漢代貿易與擴張》,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呂紅亮,《跨喜馬拉雅的文化互動: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亞諾什·哈爾馬塔(J. Harmatta) 主編,徐文堪、芮傳明譯,《中亞文明史 第二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2。

東亞考古學會(江上波夫、水野清一)編,《內蒙古·長城地帶》,東京:東亞考古學會, 1935。

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嚳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青海省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綱》,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孫機,《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 社,1996。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圍民族的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

鳥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文化比較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匈奴時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張雲,《絲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張雲,《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張增祺,《滇國與滇文化》,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7。

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

張增祺,《探秘撫仙湖》,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2。

張增祺,《中國西南民族考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

許智範、肖明華,《南方文化與百越滇越文明》,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陳永志編,《內蒙古出土瓦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傅嘉儀編著,《中國瓦當藝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焦天龍,《中國考古學概念的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館、晉寧縣文物管理所編著,《晉寧石寨山——第五次 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昆明羊甫頭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

楊巨平,《互動與交流:希臘化世界與絲綢之路關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2。

楊斌(Yang Bin)著,韓翔中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臺北:八 旗文化,2021。

- 趙永勝,《中國西南與中南半島古代民族源流、分布及其演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19。
- 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蔣志龍、樊海濤、《古滇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 魯金科 (С. И. Руденко) 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北京:中華書局, 2012。
-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 霍巍、王煜、呂紅亮,《考古發現與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時代》,北京:科學出版 社,2015。
- V.I. サリアニディ(V. I. Sarianidi)著,加藤九祚譯,《シルクロ——ドの黃金遺宝》,東京:岩波書店,1988。
-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
- Alexeev, Andreï I., Ludmilla L. Barkova and Ludmilla K. Galanina. *Nomades des Steppes Les Scythes*. Paris: Éditions Austrement, 2001.
- Anthony, David W. with Jennifer Y. Chi, eds. *The Lost World of Old Europe: the Danube Valley*, 5000-350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ellwood, Peter. ed. *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15.
- Boardman, John. The Greeks in As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5.
- Brentjes, Burchard. Arms of the Sakas (and Other Tribes of the Central Asian Steppes). Varanasi: Rishi Publications, 1996.
- Bunker, Emma C., C. Bruce Chatwin and Ann 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0.
- Catrin, Kost. The Practice of Imagery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Steppe (5th-1st centuries B.C.E.).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4.
- Chew, Sing C. The Southeast Asia Connection: Trade and Polities in the Eurasian World Economy, 500 B.C.-A.D. 5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8.
- Coles, J. M. and A. F. Harding. *The Bronze Age in Europ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 c.* 2000-700 B.C.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Cunliffe, Barry. *The Scythians Nomad Warriors of the Step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Evans, Arthur. The Palace of Minos: 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the Early Cretan Civiliz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Discoveries at Knossos. London: Macmillan, 1928.
- Galanina, Liudmila Konstantinovna. ed. Scythian Art: The Legacy of the Scythian World, Mid-7th to 3rd Century B.C.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 1986.
- Gorshenina, Svetlana. et Claude Rapin. De Kaboul a Samarcande. Paris: Gallimard, 2001.
- Harmatta, János.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 Jettmar, Karl. Art of the Steppes. Translated by Ann E. Keep.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4.
- Jongkees-Vos, M.F.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Groningen: J.B. Wolters, 1963.
-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3r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Lebedynsky, Iaroslav. Les Scythes. Paris: Éditions Austrement, 2001.
- Mair, Victor H. 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 McEnroe, John C. Architecture of Minoan Crete: 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 McNeill, William H.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From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 Ancient Treasures from the Museums of the USSR., 3000 B.C.-100 B.C.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5.
- Nikonorov, Valerii. *The Armies of Bactria 700 B.C.-450 A.D. Vol. 2.* Stockport: Montvert Publications, 1997.
- Pang, Tina. *Treasur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Animal Art from 800 B.C. to 200 A.D.* New York: Ariadne Galleries, 1998.
- Peregrine, Peter N. and Ilia Peiros and Marcus Feldman eds. *Ancient Human Migration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9.
- Rawson, Jessica. The Chinese Bronzes of Yunnan.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3.
- Roerich, George N.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 Tribe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30.
- Roerich, George N. Trails to Inmost Asia: Five Years of Exploration with the Roeric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 Rosenfield, John M.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Simpson, St. John. and Svetlana Pankova. eds. *Scythians Warriors of Ancient Siber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7.
- Steiner, Ann. Reading Greek va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un, Zhixin Jason. ed. *Age of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7.
- Tong, Tao. The Silk Roads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y). Oxford: Archaeopress, 2013.
- Trousdale, William. *The Long Sword and Scabbard Slide in Asia*.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5.
- Tucci, Giuseppe. Transhimalaya. Translated by James Hogarth.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73.
- Watson, William.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 2. 論文

- Emma C. Bunker 著,趙永勤譯,〈滇國藝術中的「動物格鬥」和騎馬獵手〉,《雲南文物》,第 26 期,1989 年,頁 129-13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縣加瓦艾日克墓地的發掘〉,《考古》,1997年9期,頁21-32。
- 王炳華,〈貴霜王朝與古代新疆〉,《西域研究》,1991年1期,頁35-38。
- 王輝,〈近年來戰國時期西戎考古學文化的新發現與新認識〉,收入蔡慶良、張志光主編, 《嬴秦溯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324-333。
- 王輝、〈張家川馬家塬墓地相關問題初探〉、《考古》、2009年10期、頁70-77。
- 仝濤,〈論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晉墓出土銀壺的異域風格〉,《考古》,2009年5期, 頁70-79。
- 仝濤、李林輝、〈歐亞視野內的喜馬拉雅黃金面具〉、《考古》、2015年2期,頁92-102。
- 史黨社,〈多彩的邊疆——考古材料所見西元前7-3世紀秦之西北邊地文化〉,收入蔡慶良、張志光主編,《嬴秦溯源》,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316-323。
- 尼克魯(Lukas Nickel),〈南越銀盒——異域風格的秦代銀器〉,收入曹瑋、任天洛(Rehren, T.) 主編,《秦時期冶金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4,頁84-94。
- 申旭、〈藏彝民族走廊與西亞文化〉、《西藏研究》、2000年2期、頁71-79。

- 白鳥芳郎著,朱桂昌譯,〈石寨山文化的擔承者——中國西南地區所見斯基泰文化的影響〉,《民族研究譯叢》,第1輯,1982年,頁38-66。
- 白鳥芳郎著,青山譯,〈從石寨山文化中看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響——種族、民族的交流及 其途徑〉,《民族譯叢》,1980年4期,頁49-54、60。
- 任乃強,〈中西陸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雜誌》,1987年1期,頁34-36。
-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 年內蒙古林西縣井溝 子遺址西區墓葬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2004 年 1 期,頁 6-19。
- 安娜托莉娅·普加琴科娃著,李琪譯,〈粟特藝術中的康居人形象——烏茲別克斯坦藝術學 考察隊的發現〉,《西北民族論叢》,第4輯,2006年3月,頁230-244。
- 米歇爾·皮拉左里著,吳臻臻譯,〈滇文化的年代問題〉,《考古》,1990年1期,頁78-86。
- 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日土縣古代岩畫調查簡報〉、《文物》,1987年2期, 頁44-50。
- 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文物局,〈西藏浪卡子縣查加溝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 6期,頁45-47。
- 吳焯,〈青海道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2期,頁123-140、86。
- 吳曉筠,〈山巓上的雄鹿、猛虎與野山羊:馬家塬馬車草原裝飾的來源與傳播途徑〉,《故宮 學術季刊》,第34 卷 1 期,2016 年 9 月,頁 1-51。
- 呂紅亮,〈中國境內出土的蝕花石珠述論〉,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編,《長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 146-175。
- 呂紅亮,〈西喜馬拉雅岩畫歐亞草原因素再檢討〉,《考古》,2010年 10期,頁76-85。
- 呂紅亮,〈西喜馬拉雅地區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15年1期,頁1-34。
- 李旻,〈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考古學報》,2017年3期,頁287-316。
- 李零,〈論西辛戰國墓裂瓣紋銀豆——兼談我國出土的類似器物〉,《文物》,2014年9期, 頁 58-70。
- 李曉岑、韓汝玢、蔣志龍,〈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金屬器的分析和研究〉,《文物》,2004年 11期,頁75-85。
- 李韜,〈秦漢時期中原與中亞地區單兵制式化裝備比較研究試析〉,收入新疆吐魯番學研究 院編,《吐魯番學研究——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游牧民族的起源與遷徙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37-174。
-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大陸雜誌》,第87卷第5期,1993年11月,頁1-25。
- 杜正勝,〈秦社會的「戎狄性」〉,收入氏著,《編戶齊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0,頁459-466。

-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2分,1993年6月,頁231-408。
- 杜承武、李興盛,〈察右後旗三道灣墓地〉,收入魏堅主編,《內蒙古地區鮮卑墓葬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6-54。
- 汪寧生,〈晉寧石寨山青銅器圖像所見古代民族考〉,《考古學報》,1979年4期,頁423-439。
- 汪寧生,〈試論石寨山文化〉,收入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278-293。
-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 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9月,頁15-100。
- 邢義田,〈秦漢中國與域外世界〉,收入孫志新主編,劉鳴、徐暢譯,《秦漢文明——歷史、 藝術與物質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95-111。
- 初師賓、〈絲路羌中道開闢小議〉、《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2期、頁42-46。
- 周永衛,〈南越王墓銀盒舶來路線考〉,《考古與文物》,2004年1期,頁61-64。
- 孟凡人,〈貴霜統治鄯善之說純屬虛構〉,《西域研究》,1991年2期,頁29-39。
- 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收入氏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190-234。
- 林永昌,〈東山文化的若干問題再檢討〉,《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年5月,頁113-136。
- 林梅村,〈商周青銅劍淵源考〉,收入氏著,《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頁39-63。
- 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收入氏著,《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5,頁33-67。
- 林梅村,〈漢代絲綢之路上的粟特人〉,《北方民族考古》,第3輯,2016年9月,頁193-206。
- 芮逸夫,〈僰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上,1951年12月, 頁245-278。
- 邱茲惠,〈黑格爾 I 型銅鼓與「動物紋樣」藝術〉,《南方民族考古》,第2輯,1989年6月,頁59-64。
- 邱茲惠,〈滇青銅文化多元藝術風格的涵義〉,收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編,《東亞古物 [A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42-156。
- 邵會秋,〈新疆扎滾魯克文化初論〉,《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2008年12月,頁170-183。
- 兪偉超,〈關於「卡約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認識〉,收入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193-210。

- 柳揚,〈秦藝術異質媒介間的互動、影響與交融〉,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503-523。
- 柳揚,〈馬家塬出土金銀器銅飾動物造型的歐亞草原游牧文化因素〉,收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秦與戎——秦文化與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頁24-70。
- 段清波,〈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西北大學學報》,第 45 卷第 1 期, 2015 年 1 月, 百 8-15。
- 段渝,〈中國西南早期對外交通——先秦兩漢的南方絲綢之路〉,《歷史研究》,2009年1期,頁4-23。
- 段渝,〈南方絲綢之路:中——印交通與文化走廊〉,《思想戰線》,2015年6期,頁91-97。
- 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著,李永迪譯,〈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收入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54。
- 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68-195。
- 夏鼐,〈中巴友誼的歷史〉,《考古》,1965年7期,頁357-364。
- 格爾曼·漢夫勒著,侯改玲、申娟譯,〈中國雕塑藝術的誕生——臨潼兵馬俑觀感〉,《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1年第1期,頁23-27。
- 桑秀雲,〈蜀布邛竹傳至大夏路徑的蠡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1 本 1 分,1969 年 3 月,頁 67-86。
- 烏蘭察布博物館,〈察右後旗三道灣墓地〉,收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 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407-433。
- 祝銘、〈從金銀飾看歐亞草原文化對滇文化的影響〉、《草原文物》、2019年2期,頁63-75。
- 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1976年第11期, 頁12-24、41。
- 袁仲一,〈釋「王負劍」〉,收入徐衛民、雍際春主編,《早期秦文化研究》,西安:三秦出版 社,2006,頁13-20。
- 馬雍、〈古代鄯善、于闐地區佉盧文字資料綜考〉,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叢考》,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60-88。
-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2期,頁18-28。
- 馬豔,〈商都東大井類渦紋飾件與內陸歐亞西部渦紋裝飾元素〉,《邊疆考古研究》,第 22 輯,2017年12月,頁141-150。
- 張文立,〈卡約文化銅器動物紋初探〉,《草原文物》,2016年2期,頁84-92。

- 張建林、〈日土岩畫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2期、頁51-54、87。
- 張雅軍等,〈從頭骨形態學和古 DNA 探究公元 3-4 世紀西藏阿里地區人群的來源〉,《人類學學報》, 2020 年 3 期,頁 435-449。
- 張雲,〈本教古史傳說與波斯祆教的影響〉,《中國藏學》,1998年4期,頁70-80。
- 張增祺,〈古代雲南騎馬民族及其相關問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2期, 頁13-20、77。
- 張增祺,〈再論雲南青銅時代「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者〉,收入雲南省博物館編, 《雲南青銅文化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 320-354。
- 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87年9期, 頁 808-820。
- 張增祺,〈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池區域發現的西亞文物〉,《思想戰線》,1982年2期, 頁82-87。
- 張增祺,〈關於晉寧石寨山青銅器上一組人物形象的族屬問題〉,《考古與文物》,1984年4期,頁88-92。
- 梁雲,〈早期秦文化與西戎文化的關係〉,《故宮文物月刊》,第 398 期,2016 年 5 月, 頁 22-29。
- 梅建軍、高濱秀、〈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新疆文物》,2003年1期,頁47-57。
- 莫任南,〈東漢和貴霜關係史上的兩個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2期,頁67-74。
- 郭物,〈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為中心〉,收入劉慶桂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考古學視野下的城市、工藝傳統與中外文化交流:劉慶桂 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 240-267。
- 陳永志,〈內蒙古出土瓦當概論〉,收入氏編,《內蒙古出土瓦當》,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頁3-31。
- 陳洪、武麗娜、李宇、聶莉,〈秦人屈肢葬與西南地區的屈肢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總5輯,2015年10月,頁176-183。
- 陳曉露,〈塔里木盆地的貴霜大月氏人〉,《邊疆考古研究》,第19輯,2016年6月, 頁207-221。
- 陳曉露,〈樓蘭壁畫墓所見貴霜文化因素〉,《考古與文物》,2012年2期,頁79-88。
- 傳鶴里(Harry Falk)撰、慶昭蓉譯,〈月氏五翕侯〉,收入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 第14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123-182。
- 喬伊斯·懷特(Joyce C.White)、伊麗莎白·漢密爾頓(Elizabeth G. Hamilton)著, 陳瑋譯,〈東南亞青銅技術起源新論〉,《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年5月, 頁59-112。

- 喬梁,〈關於「海上絲路」起始時間的探討〉,收入許倬雲、張忠培主編,《新世紀的考古學──文化、區位、生態的多元互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518-532。
- 童恩正,〈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考古》,1999年4期,頁79-87。
- 童恩正,〈西藏考古綜述〉,《文物》,1985年9期,頁9-19。
-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 《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7-43。
-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雲南江川縣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發掘〉,《考古》,2001年 12期,頁25-40。
- 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2期, 頁 97-156。
- 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年 1期,頁43-63。
- 新疆博物館文物隊,〈且末縣扎滾魯克五座墓葬發掘報告〉,《新疆文物》,1998年3期, 頁 2-18。
- 新疆博物館考古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縣文物管理所,〈且末扎滾魯克 二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2 年 1-2 期,頁 1-21。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縣文物管理所,〈新疆且 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年1期,頁89-136。
- 楊建華、〈三叉式護手劍與中國西部文化交流的過程〉、《考古》、2010年4期,頁71-78。
- 楊富學,〈靴扣:貴霜王朝建立者源自大月氏新證〉,《敦煌研究》,2020年5期,頁11-21。
- 葛劍雄,〈關於古代西南交通的幾個問題〉,收入段渝主編,《南方絲綢之路研究論集》, 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151-157。
-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考古學報》,1995年1期,頁79-107。
- 翟國強,〈北方草原文化南漸研究——以滇文化爲中心〉,《思想戰線》,2014年3期, 頁 18-30。
- 翟國強,〈滇文化與北方地區文化及族群關係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1期, 頁73-86。
- 趙賓福,〈遼西山地夏至戰國時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研究的再檢討〉,《邊疆考古研究》, 第5輯,2006年12月,頁32-69。
- 趙德雲,〈突瓣紋銀、銅盒三題〉,《文物》,2007年7期,頁81-88。
- 劉文鎖,〈漢代「胡人」圖像補說〉,收入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委會編, 《漢代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487-493。
- 劉珂、蔡郎與、〈試論「塞人」黃金工藝入滇〉、《中華文化論壇》,2016年9期, 頁95-103。

- 劉翔,〈青海大通縣塞伊瑪——圖爾賓諾式倒勾銅矛考察與相關研究〉,《文物》,2015年10期,頁77-85。
- 劉翔、王輝、〈甘肅省博物館藏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調查與研究〉、《西部考古》、 第 14 期, 2017 年 4 月, 頁 48-58。
- 劉豔,〈漢帝國與希臘化世界的交往——再議海昏侯墓金器中的花絲裝飾〉,《早期中國研究》,第4輯,2021年3月,頁161-188。
- 劉豔、于建軍、楊軍昌、李文瑛、〈與地中海世界的遠距離聯繫?——新疆阿勒泰地區東塔勒德墓地出土山毛櫸果造型的黃金垂飾研究〉、《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8輯,2022年6月,頁1-24。
- 潘玲,〈兩漢時期東北地區和長城地帶的三種耳墜〉,收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 《新果集——慶祝林澐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421-436。
- 蕭明華,〈青銅時代滇人的青銅扣飾〉,《考古學報》,1999年4期,頁421-436。
- 霍川、霍巍、〈漢晉時期藏西「高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及其歷史意義〉、《西藏大學學報》、 2017年1期,頁52-57。
- 霍巍,〈西藏天葬風俗起辨析〉,《民族研究》,1990年5期,頁39-46。
- 霍巍,〈從考古材料看吐蕃與中亞、西亞的古代交通〉,《中國藏學》,1995年4期, 頁48-63。
- 霍巍,〈胡人俑、有翼神獸、西王母圖像的考察與漢晉時期中國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 《九州學林》,第1卷2期,2004年3月,頁36-92。
- 霍巍,〈論橫斷山脈地帶先秦兩漢時期考古學文化的交流與互動〉,《藏學學刊》,第2輯, 2005年6月,頁155-169。
- 霍巍、趙德雲,〈滇文化動物意匠與歐亞草原關係的再檢視〉,收入氏著,《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 51-80。
- 霍巍,〈「西南夷」與南方絲綢之路〉,《中國文化論壇》,2008 年 12 月增刊,頁 114-120。
- 霍巍,〈從考古發現看西藏史前的交通與貿易〉,《中國藏學》,2013年2期,頁5-24。
- 霍巍,〈論西藏發現的早期金屬器和早期金屬時代〉,《考古學報》,2014年3期,頁327-350。
- 霍巍,〈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與周邊文化的關係〉,《北方民族考古》,第2輯,2015年 8月,頁103-121。
- 霍巍,〈「高原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及其歷史意義〉,《社會科學家》,2017年11期, 頁19-24。
- 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問題的思考〉,《中國藏學》,2018年2期,頁5-12。
- 謝崇安,〈略述石寨山文化藝術品中所見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跡〉,《四川文物》,2004年 6期,頁28-33。

- 謝崇安,〈雲南石寨山文化與越南東山文化的比較研究〉,《考古學集刊》,第 21 期,2018 年 10 月,頁 149-188。
- 韓汝玢、李曉岑、〈雲南古滇地區的金屬製作技術與北方草原青銅器〉,收入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編,《中國冶金史論文集·第5輯》,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2,頁56-66。
- 韓建業,〈「彩陶之路」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與文物》,2013年1期,頁28-37。
- 羅伯特·強南(Roberto Ciarla)、墨哥里勞·奧里柯利(Marcello Orioli)著,盧智基譯, 〈中國西南游牧考古爭議〉,《南方民族考古》,第7輯,2011年5月,頁185-200。
- 饒宗頤,〈由出土銀器論中國與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收入氏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第十冊卷七·中外關係史》,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頁 167-192。
- 饒宗頤,〈蜀布與 Cinapatta —— 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45 本 4 分,1974 年 6 月,頁 561-584。
- 工藤元男,〈蜀布と邛竹杖〉,《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 47 輯 4 分冊,2001 年 2 月,頁 81-94。
- 江上波夫、〈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定住農耕民族と遊牧騎馬民族——古代日本騎馬民族国家成立過程の比較研究資料の紹介〉、收入氏著、《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2 東アジア文明の源流》、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 237-271。
- Abdullaev, Kazin. "Nomadism in Central Asi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nd-1st Centuries B.C.)." In *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 Papers on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 in Antiquity*, edited by Antonio Invernizzi, 151-161. Firenze: Le lettere, 1995.
- Abdullaev, Kazin. "Armour of Ancient Bactria." In *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 Papers on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 in Antiquity*, edited by Antonio Invernizzi, 163-180. Firenze: Le lettere, 1995.
- Avanesova, Nona A. "The Zeravshan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Bactria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cultural worlds." In *The world of the Oxus Civilization*, edited by Bertille Lyonnet & Nadezhda A. Dubova, 665-6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Brosseder, Ursula B.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ited by Jan Bemmann & Michael Schmauder, 199-332.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 Brough, John.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4.3 (1961): 517-530.
- Brough, John.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3 (1965): 582-612.
- Bunker, Emma C. "The Steppe Connection." Early China 9/10 (1983-85): 70-76.
- Bunker, Emma C.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s to the Dong-son Culture."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2, edited by Noel Barnard and Douglas Fraser, 291-328.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 Bunker, Emma. "Sources of Foreign Elements in the Culture of Eastern Zhou." I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edited by George Kuwayama, 84-93.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eattle: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 Bussagli, Mario. "Bronze Objects Collected by Prof. G. Tucci in Tibet: A Short Survey of Religious and Magic Symbolism." *Artibus Asiae* 12.4 (1949): 331-347.
- Castelluccia, Manuel. "The Militarization of a Society: The Example of Transcaucasia in the Early Iron Age: An Archaeological Overview." *Ancient Cil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3.1 (2017): 91-126.
- Chiou-Peng, TzeHuey. "The "Animal Style" Art of the Tien Cultur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5.
- Chiou-Peng, TzeHuey. "Western Yunnan and Its Steppe Affinities." In *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I*,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280-304.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 Chiou-Peng, TzeHuey. "Early Copper-base Metals in Western Yunnan." In *How Objects Tell Stories: Essays in Honor of Emma C. Bunker*, edited by Katheryn M. Linduff & Karen S. Rubinson, 153-172. Turnhout: Brepols, 2018.
- Chiou-Peng, Tzehuey. "Spiral Handle and Three-Pronged Guard: Stylistic or Technical Traits?" In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aterial concern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Anke Hein, 109-121.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 Christopoulos, Lucas. "Hellenes and Romans in Ancient China (240 B.C.-1398 A.D.)." *Sino-Platonic Papers* 230 (2012): 1-79.
- Ciarla, Roberto. "A Long Debated Question: Pastoralism in South-West China. A Different Approach."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ited by Bruno Genito, 73-85.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 Farrokh, K.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Parthian and Sasanian Military Helmet." In Crowns, Hats, Turbans and Helmets: Headgear in Iranian History vol. I, edited by K. Maksymiuk and Gh. Karamian, 121-163. Siedlce: Siedlce University & Tehran Azad University, 2017.
- 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995): 17-67.
- Gray, Basil. "Once More Yunnan and Southeast Asia." Orientations 20.6 (1989): 44-51.
- Grenet, Frantz. "The Nomadic Element in the Kushan Empire (1st-3rd Century A.D.)."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3 (2012): 1-22.
- Haloun-Göttingen, Gustav. "Zur Üe-tsï-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91.2 (1937): 243-318.
- Hein, Anke. "Metal, Salt, and Horse Skulls: Elite-Level Exchange and Long-Distance Human Movement in Prehistoric Yanyua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aterial concern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Anke Hein, 89-108.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 Hein, Anke. "Diffusionism, Migration,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Border Region." In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material concerns of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Anke Hein, 1-17.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 Heine-Geldern, Robert von. "Das Tocharerproblem und die Pontische Wanderung." *Saeculum* 2 (1951): 225-255.
- Heine-Geldern, Robert von. "Some Tribal Art Styles of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 in Art History." In *The Many Faces of Primitive Ar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Douglas Fraser, 165-221. N.J.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 Hitch, Douglas A. "Kushan Tarim Dominatio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2.3/4 (1988): 170-192.
- Hui, Wan.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the Majiayuan Cemetery and Qin's Interaction with Steppe Cultures." In Beyond the First Emperor's Mausoleum: New Perspectives on Qin Art, edited by Liu Yang, 212-239.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2014.
- Ilyasov, Jangar Ya. and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98): 107-159.
- Karlene, Jones-Bley. "Tall Hats: Reaching to the Sky." 收入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編,《吐魯番學研究: 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游牧民族的起源與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92-98。

- Karlgren, Bernhard. "Huai and Ha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3 (1941): 1-125.
- Karlgren, Bernhard.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 (1937): 1-118.
- Karlgren, Bernhard. "Notes on the Grammer of Early Bronze Décor."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3 (1951): 1-80.
- Kemenczei, Tibor. "Hungarian Early Iron Age Metal Find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Stepp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ited by Bruno Genito, 591-618.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 Knauer, Elfriede R. "Knemides in the East?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act of Greek Body Armor on "Barbarian" Tribes." In *Nomodeiktes: Greek Studies in Honor of Martin Ostwald*, edited by Ralph M. Rosen and Joseph Farrell, 235-254.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Laing, Ellen Johnston. "Recent Finds of Western-Related Glassware, Textiles, and Metalwork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9 (1995): 1-18.
- Lapteff, Sergey. "On Post-Hellenistic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New Materials Recently Found in Southern Thailand and around Tonle Sap Lake in Cambodia."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2 (2016): 295-320.
- Linduff, Katheryn. M."Production of Signature Artifacts for the Nomad Market in the State of Qin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4th-3rd Century B.C.E.)."in *Metallurgy and Civiliz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edited by Jianjun Mei and Thilo Rehren, 90-96. London: Archetype, 2009.
- Litvinsky, B. A. "The Bactrian Ivory Plate with a Hunting Scence from the Temple of the Oxu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2001): 137-166.
- Liu, Yan. "The Han Empir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Prestige Gold and the Exotic Horse."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Archaeometry 20.3 (2020): 175-198.
- Liu, Yang. "Nomadic Influences in Qin Gold." Orientations 44.2 (2013): 1-7.
- Miniaev, Sergei 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Images on Deer Stones." The Silk Road 11 (2013): 54-59.
- Molodin, Vyacheslav. and Natalya Polosma'k. "Southern Siberia During the Bronze and Early Iron Periods." I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Vol. 3 West and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edited by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1638-16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Moshkova, Marina G. "Late Sarmatian Culture." I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edited by Jeannine Davis-Kimball, Vladimir A. Bashilov and Leonid T. Yablonsky, 149-163.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 Nickel, Lukas. "The First Emperor and Sculpture in China."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6.3 (2013): 413-447.
- Olbrycht, Marek Jan. "Arsacid Iran and the Nomads of Central Asia Ways of Cultural Transfer."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ited by Jan Bemmann & Michael Schmauder, 333-390.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 Orioli, Marcello. "Pastoralism and Nomadism in South-West China: a Brief Survey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ited by Bruno Genito, 87-108.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 Psarras, Sophia-Karin.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Artibus Asiae* 60.1 (2000): 5-58.
- Pulleyblank, E. G. "Chinese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Kaniska." In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ka: Submit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Date of Kaniska. London*, 20-22 April, 1960., edited by A. L. Basham, 247-258. Leiden: E. J. Brill, 1968.
- Rawson, Jessica. "Steppe Weap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Role of Hand-to-hand Combat." 《故宮學術季刊》,第 33 卷 1 期,2015 年 9 月,頁 37-95。
- Rubinson, Karen S. "The Authority of Horse-Rider Iconography: Imagery as the Power of the Past (The Eurasian Steppe and Yunnan in the late Millennium B.C.E.)." In *How Objects Tell Stories: Essays in Honor of Emma C. Bunker*, edited by Katheryn M. Linduff & Karen S. Rubinson, 137-150. Turnhout: Brepols, 2018.
- Samolin, William. "Western Elements in the Art of Ch'u."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1, edited by Noel Barnard and Douglas Fraser, 187-198.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 Skupniewicz, Patryk & Marcin Lichota. "Diadem on the Head from Khalchayan Battle Scene and Possib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position." In *Crowns, Hats, Turbans and Helmets, The Headgear in Iranian History, Volume 1: Pre-Islamic Period*, edited by. Katarzyna Maksymiuk and Gholamreza Karamian, 69-95. Siedlce & Tehran: Publishing House of Siedlce University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17.
- So, Jenny F. "Foreign/Eurasian Eements in Pre-imperial Qin Culture: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Types." In *Beyond the First Emperor's Mausoleum: New Perspectives on Qin Art*, edited by Liu Yang, 192-211.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2014.
- Thote, Alain. "Defining Qin Artistic Traditions: Heritage, Borrowing, and Innovation." In Beyond the First Emperor's Mausoleum: New Perspectives on Qin Art, edited by Liu Yang, 12-29. Minneapoli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2014.

- Törbat, Tsagaan., Giscard Pierre-Henri and Dunbüree Batsükh. "First Excavation of Pazyryk Kurgans in Mongolian Altai." In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edited by J. Bemmann. et al., 221-230.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t Bonn, 2009.
- Tucci, Giuseppe. "On Some Bronze Objects Discovered in Western Tibet." *Artibus Asiae* 5. 2/4 (1935): 105-116.
- Vinogradov, N. B. and V. Epimakhov. "Variants in Models of Transition: The Cimmerian Traditions of the Gordion Tumuli (Phrygia): Found in the Altai Barrows (Bashadar, Pazyryk)." In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 edited by Jeannine Davis-Kimball et al., 247-258.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 White, Joyce C. and Elizabeth G. Hamilton. "The Transmission of Early Bronze Technology to Thailand: New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2.4 (2009): 357-397.
- Zbenovich, Vladimir G. "The Tripolye Culture: Centenary of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0.2 (1996): 199-241.

## 圖版出處

- 圖 1 雲南晉寧石寨山納貢貯貝器上的高鼻多鬚配劍人物。圖版取自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頁 142 圖 73。
- 圖 2 雲南晉寧石寨山鎏金銅扣飾上高鼻深目配長劍的人物造型。圖版 2 (左) 取自 Zhixin Jason Sun ed.. Age of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7, 208: 圖版 2 (右) 取自 Emma Bunker, "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s to the Dong-son Culture."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2, edited by Noel Barnard and Douglas Fraser,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302, fig. 7.
- 圖 3 李家山 M69 貯貝器上之著褲椎髻配長劍人像。圖版 3 (右)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24 圖 84-17:圖版 3 (左)取自蔣志龍、樊海濤,《古滇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 348 圖 8-35。
- 圖 4 古希臘陶盤上斯基泰人的菱形紋飾服裝。圖版取自 Jongkees-Vos, M.F. Scythian Archers in Archaic Attic Vase-Painting. Groningen: J. B. Wolters, 1963, 24, pl. IXb.
- 圖 5 古希臘陶瓶上斯基泰人的菱形紋飾服裝。圖版取自 Steiner, Ann. *Reading Greek va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4, pl. 9.7.
- 圖6 斯基泰人緊身衣褲的圓點紋飾。圖版6(上右)取自 Andreï I. Alexeev., Ludmilla L. Barkova and Ludmilla K. Galanina. Nomades des Steppes Les Scythes. Paris: Éditions Austrement, 2001, p. 21, fig. 7;圖版6(上左)取自 Galanina, Liudmila Konstantinovna. ed., Scythian Art: The Legacy of the Scythian World, Mid-7th to 3rd Century B.C.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 1986, plate. 202;圖版6(中)取自 Galanina, Liudmila Konstantinovna. ed., Scythian Art: The Legacy of the Scythian World, Mid-7th to 3rd Century B.C. Leningrad: Aurora Art Pub., 1986, plate. 158;圖版6(下)取自 Lebedynsky, Iaroslav. Les Scythes. Paris: Éditions Austrement, 2001, 132.
- 圖 7 斯基泰人緊身衣褲的彎月形花紋。圖版取自 Cunliffe, Barry. *The Scythians Nomad Warriors of the Step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84, fig. 9.15.
- 圖 8 南俄斯基泰人之椎髻。圖版 8 (左) 取自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From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 Ancient Treasures from the Museums of the USSR., 3000 B.C.-100 B.C.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5, plate. 18:圖版 8 (右)取自 Simpson, St. John. and Svetlana Pankova eds. Scythians Warriors of Ancient Siber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7, 206, fig. 119.
- 圖 9 南西伯利亞斯基泰人之椎髻。圖版 9 取自 Simpson, St. John and Svetlana Pankova eds. *Scythians Warriors of Ancient Siber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7, 64, fig. 22.

- 圖 10 中亞 Takhti-Sangin 遺址出土骨雕所見貴霜時期游牧民族之椎髻。圖版 10 取自 Litvinsky, B. A. "The Bactrian Ivory Plate with a Hunting Scence from the Temple of the Oxu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2001): 138, fig. 2; 139, fig. 3; 144, fig. 6.
- 圖 11 斯基泰 薩爾馬泰式長劍。圖版 11 取自 Moshkova, Marina G. "Late Sarmatian Culture." In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 edited by Jeannine Davis-Kimball, Vladimir A. Bashilov and Leonid T. Yablonsky, 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165, fig. 17.
- 圖 12 迦膩色迦王雕像上所佩帶的長劍。圖版 12 取自 Rosenfield, John M.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fig. 2.
- 圖 13 阿富汗黄金之丘 4 號墓游牧君長所持之長劍。圖版 13 取自 V.I. サリアニディ(V. I. Sarianidi)著,加藤九祚譯,《シルクロ──ドの黄金遺宝》,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105 圖版 38。
- 圖 14 雲南晉寧石寨山擄掠扣飾武士之頭盔。圖版 14 取自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 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圖版頁 45 彩圖 90。
- 圖 15 Dalverzin Tepe 的貴霜貴族頭盔。圖版 15 取自 Patryk Skupniewicz & Marcin Lichota, "Diadem on the Head from Khalchayan Battle Scene and Possib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position." In *Crowns, Hats, Turbans and Helmets, The Headgear in Iranian History, Volume I: Pre-Islamic Period*, eds. Katarzyna Maksymiuk and Gholamreza Karamian, Siedlce & Tehran: Publishing House of Siedlce University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17, 93, fig. 5.
- 圖 16 戰爭貯貝器上的著頭盔人像。圖版 16 取自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 術出版社,1998,頁 88 圖 63。
- 圖 17 斯基泰人所使用的希臘頭盔與貯貝器人像細部比對圖。圖版 17 取自 Lebedynsky, Iaroslav. Les Scythes. Paris: Éditions Austrement, 2001, 204.
- 圖 18 安息人之頭盔。圖版 18 取自 Farrokh, K.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Parthian and Sasanian Military Helmets." In *Crowns, Hats, Turbans and Helmets: Headgear in Iranian History vol. I.*, edited by K. Maksymiuk and Gh. Karamian, Siedlce: Siedlce University & Tehran Azad University, 2017, 145-147, fig. 4.
- 圖 19 張家川馬家塬墓地鉛俑上的希臘頭盔(左)與希臘頭盔(右)之比較。圖版 19 取 自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西戎遺珍——馬家塬戰國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 物出版社,2014,頁214。
- 圖 20 石寨山擄掠扣飾上兩名頭盔戰士的戰袍。圖版 20 取自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 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頁 88 圖 63。

- 圖 21 卡爾查延(Khalchayan)王宮重裝騎兵所著之高領護頸戰袍。圖版 21 取自 Grenet, Frantz. "The Nomadic Element in the Kushan Empire (1st-3rd Century A.D.)."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3 (2012): 13, fig. 10.
- 圖 22 卡爾查延(Khalchayan)王宮出土之高領護頸戰袍雕塑。圖版 22 取自 Nikonorov, Valerii. *The Armies of Bactria 700 B.C.-450 A.D. Vol.* 2. Stockport: Montvert Publications, 1997, 62, fig. 30. 左下取自 Gorshenina, Svetlana. et Claude Rapin. *De Kaboul a Samarcande*. Paris: Gallimard, 2001, 3.
- 圖 23 奧拉特 (Orlat) 遺址骨雕帶扣上的高領護頸戰袍及復原想像圖。圖版 23 取自 Ilyasov, Jangar Ya. and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98): 146, plate. 4; 159, plate. 17.
- 圖 24 西元前二至一世紀印度 塞種人錢幣上的魚鱗甲戰袍。圖版 24 取自 Kazin Abdullaev. "Armour of Ancient Bactria." In *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 Papers on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 in Antiquity*, edited by Antonio Invernizzi, Firenze: Le lettere, 1995, 175, fig. 6-9.
- 圖 25 阿爾泰地區出土之斯基泰時期鶴嘴斧。圖版 25 取自 Törbat, Tsagaan., Giscard Pierre-Henri and Dunbüree Batsükh. "First Excavation of Pazyryk Kurgans in Mongolian Altai." In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edited by J. Bemmann et al., Bonn: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t Bonn, 2009, 227, fig. 10.
- 圖 26 江川李家山舞俑銅鼓之高筒尖頂帽。圖版 26 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 95、96。
- 圖 27 波斯貝希斯登崖刻(左)與七河地區伊斯塞克庫爾干的高頂尖帽。圖版 27 (左 2 右 2) 取自 Cunliffe, Barry. *The Scythians Nomad Warriors of the Step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 fig. 1.18, 184, fig. 7.11. 圖版 27 (左 1 右 1) 取自 Vinogradov, N. B. and V. Epimakhov. "Variants in Models of Transition: The Cimmerian Traditions of the Gordion Tumuli (Phrygia): Found in the Altai Barrows (Bashadar, Pazyryk)." In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 eds. Jeannine Davis-Kimball et al.,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253, fig. 3.
- 圖 28 阿爾泰阿爾然 2 號墓之高頂尖帽與李家山尖帽之比對。圖版 28 取自 Simpson, St. John. and Svetlana Pankova, eds. *Scythians Warriors of Ancient Siber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7, 93, fig. 75.
- 圖 29 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斧上的高鼻深目人頭像。圖版 29 (上)取自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彩版頁 8 圖 14:圖版 29 (下)取自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年1期,頁57 圖 15-3。
- 圖 30 晉寧石寨山出土之 S 形雙渦旋紋金飾。圖版 30 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館、晉寧縣文物管理所編著,《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101 圖 66-9、彩版 88-1。

- 圖 31 江川李家山墓葬的 S 形雙渦旋紋金飾。圖版 31 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97 圖 124-13。
- 圖 32 東南歐巴爾幹半島 Alvinc/ Vintu de Fos 的 S 形雙渦旋青銅鈕。圖版 32 取自 Kemenczei, Tibor. "Hungarian Early Iron Age Metal Find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Steppe."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epp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edited by Bruno Genit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4, 614, fig. 13.3.
- 圖 33 內蒙古三道灣墓地銅耳墜的左右對稱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33 取自烏蘭察布博物館,〈察右後旗三道灣墓地〉,收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 415 圖 11-18。
- 圖 34 中歐與南歐青銅時代考古中所見的 S 形雙渦旋紋小飾件。圖版 34 取自 Coles, J. M. and A. F. Harding. *The Bronze Age in Europ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 c. 2000-700 B.C.*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51, fig. 19, 199, fig. 68.
- 圖 35 烏茲別克青銅時代考古中所見的 S 形雙渦旋紋飾環(左)與中、南歐青銅時代考古的雙渦旋紋飾環(右)。圖版 35 (左) 取自 Nona A. Avanesova, "The Zeravshan Regional Variant of the Bactria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Cultural Worlds." In *The world of the Oxus Civilization*, eds. Bertille Lyonnet & Nadezhda A. Dubov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667, fig. 24.8-1:圖版 35 (右) 取自 J. M. Coles & A. F. Harding, *The Bronze Age in Europ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Europe c. 2000-700 B.C.*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21, fig. 40.
- 圖 36 江川李家山墓葬銅背甲上的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36 取自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 年 2 期,頁 120 圖 23。
- 圖 37 江川李家山墓葬 M24 出土銅箭菔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37 取自雲南省博物館,〈雲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75 年 2 期,頁 119 圖 20。
- 圖 38 昆明羊甫頭遺址銅腰扣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37 取自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昆明羊甫頭墓地·卷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 849 圖 685-1、彩版55-6。
- 圖 39 雲南牟定縣福土龍村所出土編鐘上的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39 取自許智範、肖明華,《南方文化與百越滇越文明》,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423 圖 9.1-11。
- 圖 40 克諾索斯米諾斯王宮出土中空圓筒物上的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40 取自 Evans, Arthur. The Palace of Minos: 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the Early Cretan Civilizati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Discoveries at Knossos. London: Macmillan, 1928, 194, fig. 104.b.
- 圖 41 羅馬尼亞東北部 Cucuteni 文化陶器上的 S 形雙渦旋紋雛形。圖版 41 取自 Anthony, David W. with Jennifer Y. Chi, eds. *The Lost World of Old Europe: the Danube Valley*, 5000-350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8, 142.

- 圖 42 特里波里文化陶器上的 S 形雙渦旋紋雛形。圖版 42 取自 Zbenovich, Vladimir G. "The Tripolye Culture: Centenary of Research."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0.2 (1996): 212, fig. 5.1, 215, fig. 7.9.
- 圖 43 越南東山文化出土青銅劍柄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3 取自 Heine-Geldern, Robert. "Some Tribal Styles of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 in Art History." In *The Many Faces of Primitive Ar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by Douglas Fraser, N. J.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182, fig. 18.
- 圖 44 越南東山文化出土帶扣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4 取自 Heine-Geldern, Robert. "Some Tribal Art Styles of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 in Art History." In *The Many Faces of Primitive Ar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Douglas Fraser, N. J.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183, fig. 19b.
- 圖 45 高加索地區出土青銅帶扣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5 取自 Heine-Geldern, Robert. "Some Tribal Styles of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 in Art History." In *The Many Faces of Primitive Art: A Crit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Douglas Fraser, N. J.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183, fig. 19a.
- 圖 46 南俄西徐亞地區出土牌飾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6 (左) 取自 Miniaev, Sergei 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Images on Deer Stones." The Silk Road 11 (2013): 54, fig.1: 圖版 46 (中、右) 取自 Pang, Tina. *Treasur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Animal Art from 800 B.C. to 200 A.D. New York: Ariadne Galleries, 1998, 66-68, fig. 62.
- 圖 47 東俄 Ananyino 文化金屬飾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7 取自東亞考古學會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編,《內蒙古·長城地帶》,東京:東亞考古學會,1935,頁 118 圖 69。
- 圖 48 高加索地區晚期青銅時代出土青銅腰帶上之相連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8 取自 Castelluccia, Manuel. "The Militarization of a Society: The Example of Transcaucasia in the Early Iron Age: An Archaeological Overview." *Ancient Cil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3.1 (2017): 109, fig. 10.
- 圖 49 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出土木腰牌飾及木紡輪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49 (左、中)取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縣文物管理所、〈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年1期,頁 115圖 26-4、26-11、26-12:圖版 49 (右)取自新疆博物館文物隊,〈且末縣扎滾魯克五座墓葬發掘報告〉,《新疆文物》,1998年3期,頁7圖 8-1。
- 圖 50 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二號墓地與加瓦艾日克墓地木盒上的相連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50 (左)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縣加瓦艾日克墓地的發掘〉,《考古》,1997 年 9 期,頁 27 圖 7-10;圖版 50 (右)取自新疆博物館考古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縣文物管理所,〈且末扎滾魯克二號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2 年 1-2 期,頁 4 圖 7-1。

- 圖 51 青海民和馬家窰文化馬廠類型彩陶的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51 取自青海省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30 圖 28。
- 圖 52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卡約文化之 S 形雙渦旋紋飾骨飾。圖版 52 取自青海省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 49 圖 71。
- 圖 53 寧夏于家莊墓地出土之 S 形雙渦旋紋銅牌飾。圖版 53 取自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寧夏彭堡于家莊墓地〉,《考古學報》,1995 年 1 期,頁 92 圖 14-3。
- 圖 54 內蒙古林西縣井溝子遺存出土之 S 形雙渦旋紋銅飾。圖版 54 取自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 年內蒙古林西縣井溝子遺址西區墓葬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2004 年 1 期,頁 12 圖 7-11。
- 圖 55 內蒙古地區出土帶扣上的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55 取自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70 圖 37-1、3、4。
- 圖 56 蒙古諾音烏拉匈奴墓葬中毛織物上的 S 形雙渦旋紋飾。圖版 56 取自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現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頁 69 圖 49、圖版 10。
- 圖 57 西藏阿里地區日土縣任姆棟岩畫的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57 取自西藏文管會文物普查隊,〈西藏日土縣古代岩畫調查簡報〉,《文物》, 1987 年 2 期, 頁 47 圖 12。
- 圖 58 西藏阿里地區日土縣康巴若久岩畫的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58 取自呂紅亮,〈西喜馬拉雅岩畫歐亞草原因素再檢討〉,《文物》, 2010 年 10 期, 頁 81 圖 5-1。
- 圖 59 關中雍城(左)及咸陽(右)出土的秦國 S 形雙渦旋紋瓦當。圖版 59(左)取自傳嘉儀編著,《中國瓦當藝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12 圖 14:圖版 59(右)取自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文物》,1976年第 11 期,圖版 3-2。
- 圖 60 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的 S 形雙渦旋紋瓦當。圖版 60 取自陳永志編,《內蒙古出土瓦當》,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 圖版 10。
- 圖 61 戰國中山國國王譽墓出土陶器上的 S 形雙渦旋紋。圖版 61 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譽墓 ──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475 圖 215-3、頁 476 圖 216-2、頁 483 圖 220-1、頁 490 圖 224-1。
- 圖 62 Y字型文化帶。圖版 62 底圖取自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收入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6,頁 19 圖 1。
- 圖 63 秦漢時期的西南絲綢之路。圖版 63 (上)取自楊斌 (Yang Bin)著,韓翔中譯,《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臺北:八旗文化,2021,頁 101 圖 2.1:圖版 63 (下)取自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二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扉頁。

## Hellenistic and Inner Eurasian Affinities in the Yunnan Jinning Shizhaishan Culture\*

Chen, Chien-wen\*\*

## Abstract

In the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 located in Shizhaishan, Jinning District, there are some unearthed relics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Inner Eurasian culture, especially the so-called "Scythian-Siberian animal motifs," which has attracted a remarkable amount of attention in academia. The author not only analyzes the patterns on the unearthed relics from the Shizhaishan culture but also compares them with those on the artifacts from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in Central Asia, in the hope of clarify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ner Eurasia and Yunnan in the Han dynasty from ethn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exploring the migratory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 Eurasian nomads and early Southwest China. Furthermore, it is also stat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nsistency in some clothing and weapons of the Scythian-Saka, Hellenistic military equipment, and Dian culture. Another possible Inner Eurasian feature is the "S"-shaped double-spiral pattern that appeared frequently in the Dian culture. This kind of decoration may originate in Southeast Europe, which later on spread to such places as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 Xinjiang, and Tibet, and eventually entered the Yunnan area along the edg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author covers the possible paths of Inner Eurasian elements entering Yunnan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Inner Eurasian factors in Shizhaishan relics v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Keywords:** Shizhaishan culture, Inner Eurasia,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Kushan, "S"-shaped double-spirals patterns, Yuezhi

<sup>\*</sup> Received: 7 March 2022; Accepted: 29 August 2022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圖 1 雲南晉寧石寨山納貢貯貝器上的高鼻多鬚配劍人物





圖 2 雲南晉寧石寨山鎏金銅扣飾上高鼻深目配長劍的人物造型







圖 3 李家山 M69 貯貝器上之著褲椎髻配長劍人像



圖 4 古希臘陶盤上斯基泰人的 菱形紋飾服裝



圖 5 古希臘陶瓶上斯基泰人的菱形紋飾服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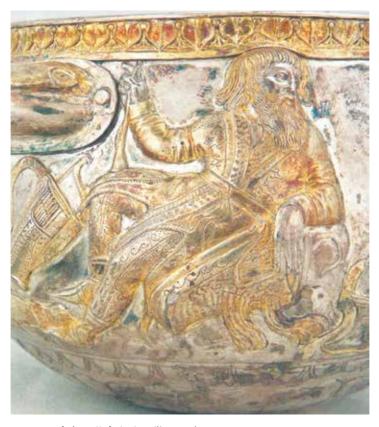


圖 7 斯基泰人緊身衣褲的彎月形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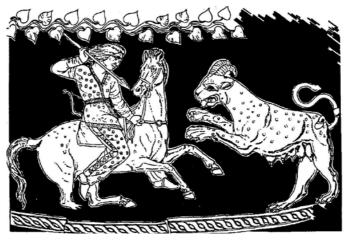


圖 6 斯基泰人緊身衣褲的圓點紋飾





圖 8 南俄斯基泰人之椎髻



圖 9 南西伯利亞斯基泰人之椎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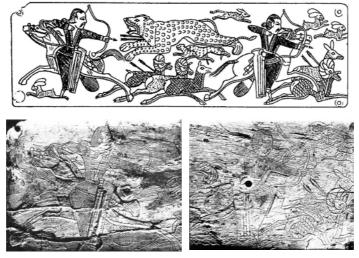


圖 10 中亞 Takhti-Sangin 遺址出土骨雕所見貴霜時期游牧民族之椎髻







左:圖11 斯基泰-薩爾馬泰式長劍

中:圖12 迦膩色迦王雕像上所佩帶的長劍

右:圖13 阿富汗黄金之丘4號墓游牧君長所持之長劍



圖 14 雲南晉寧石寨山擄掠扣飾武士之頭盔



圖 15 Dalverzin Tepe 的貴霜貴族頭盔



圖 16 戰爭貯貝器上的著頭盔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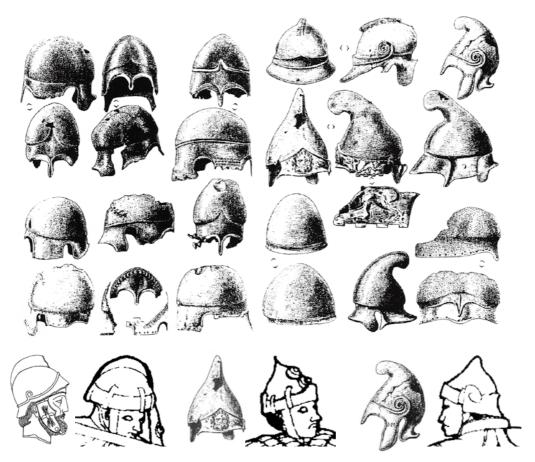


圖 17 斯基泰人所使用的希臘頭盔與貯貝器人像細部比對圖



圖 18 安息人之頭盔



圖 19 張家川馬家塬墓地鉛俑頭盔(左) 與希臘頭盔(右)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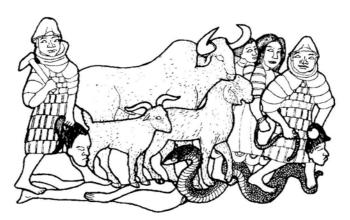


圖 20 石寨山擄掠扣飾上兩名頭盔戰士的戰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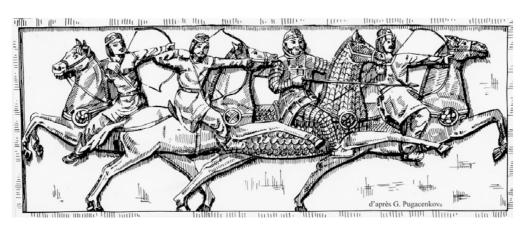


圖 21 卡爾查延 (Khalchayan) 王宮重裝騎兵所著之高領護頸戰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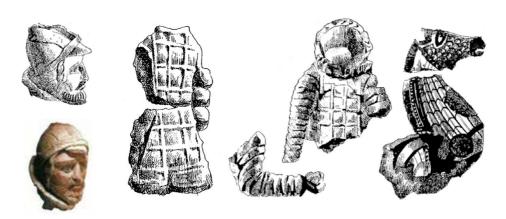


圖 22 卡爾查延 (Khalchayan) 王宮出土之高領護頸戰袍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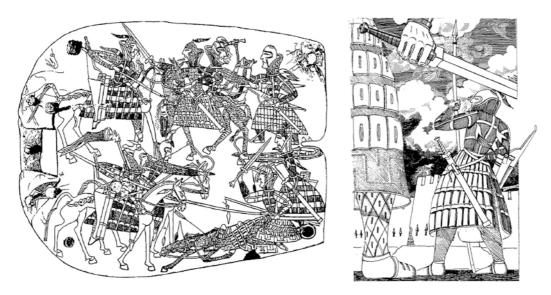


圖 23 奥拉特 (Orlat) 遺址骨雕帶扣上的高領護頸戰袍及復原想像圖



圖 24 西元前二至一世紀印度—— 塞種人錢幣上的魚鱗甲戰袍

圖 25 阿爾泰地區出土之斯基泰時期鶴嘴斧







圖 26 江川李家山舞俑銅鼓之高筒尖頂帽







圖 27 波斯貝希斯登崖刻 (左) 與七河地區伊斯塞克庫爾干的高頂尖帽



圖 28 阿爾泰阿爾然 2 號墓之高頂尖帽與李家山尖帽之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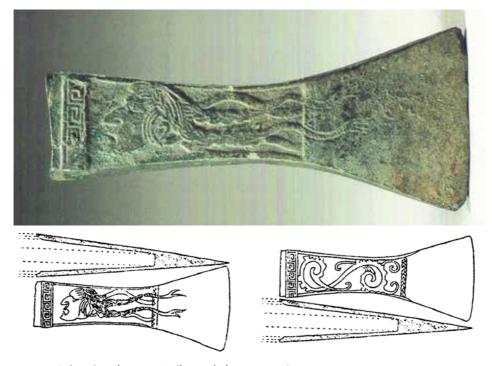


圖 29 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銅斧上的高鼻深目人頭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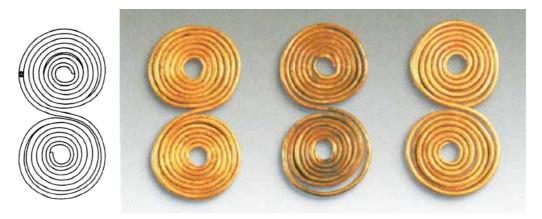


圖 30 晉寧石寨山出土之 S 形雙渦旋紋金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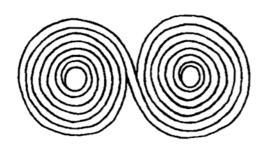


圖 31 江川李家山墓葬的 S 形雙渦旋紋金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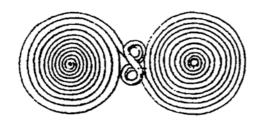


圖 32 東南歐巴爾幹半島 Alvinc/Vintu de Fos 的 S 形雙渦旋青銅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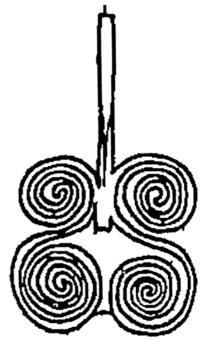


圖 33 內蒙古三道灣墓地銅耳墜的左右 對稱 S 形雙渦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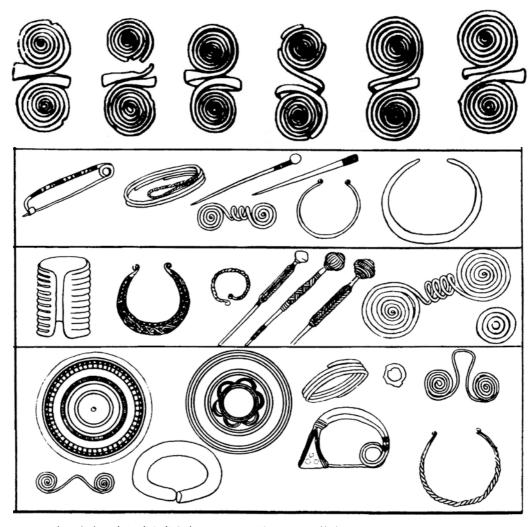


圖 34 中歐與南歐青銅時代考古中所見的 S 形雙渦旋紋小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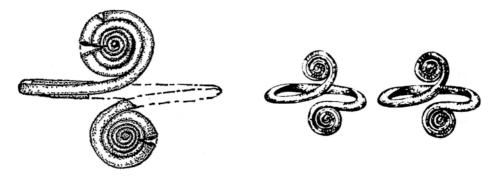


圖 35 烏茲別克青銅時代考古中所見的 S 形雙渦旋紋飾環 (左)與中、南歐青銅時代考古的 S 形 雙渦旋紋飾環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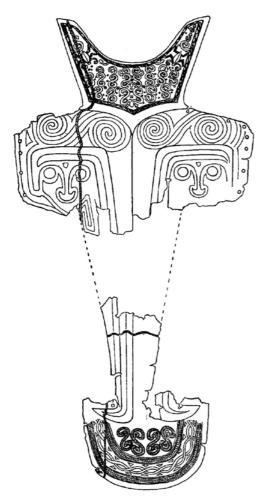


圖 36 江川李家山墓葬銅背甲上 的 S 形雙渦旋紋



圖 37 江川李家山墓葬 M24 出土銅箭 菔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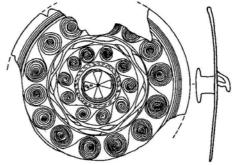


圖 38 昆明羊甫頭遺址銅腰扣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39 雲南牟定縣福土龍村所出土 編鐘上的 S 形雙渦旋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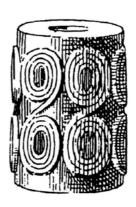


圖 40 克諾索斯米諾斯王宮出土中空 圓筒物上的 S 形雙渦旋紋





圖 41 羅馬尼亞東北部 Cucuteni 文化陶器上的 S 形雙渦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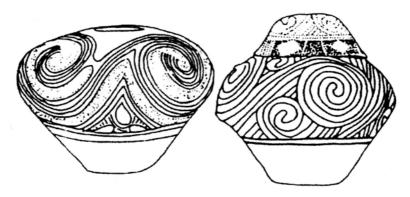


圖 42 特里波里文化陶器上的 S 形雙渦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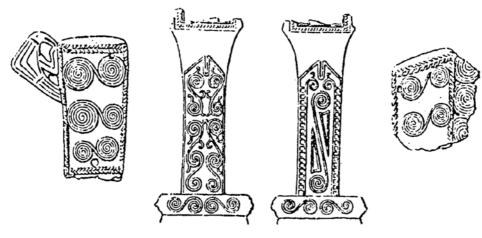


圖 43 越南東山文化出土青銅劍柄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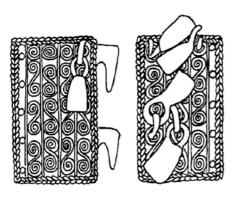


圖 44 越南東山文化出土帶扣上 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45 高加索地區出土青銅帶扣上 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46 南俄西徐亞地區出土牌飾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47 東俄 Ananyino 文化金屬飾 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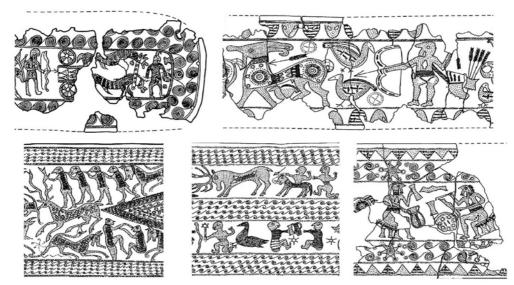


圖 48 高加索地區晚期青銅時代出土青銅腰帶上之相連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49 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出土木腰牌飾及木紡輪上之 S 形雙渦旋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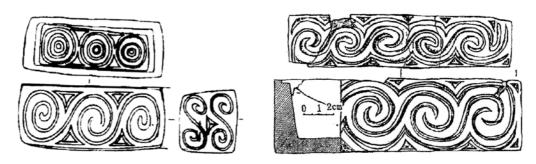


圖 50 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二號墓地 (右) 與加瓦艾日克墓地 (左) 木盒上的相連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51 青海民和馬家窰文化馬廠類型彩陶 的S形雙渦旋紋飾



圖 52 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卡約文化之 S 形雙渦旋紋 飾骨飾



圖 53 寧夏于家莊墓地出土之 S 形 雙渦旋紋銅牌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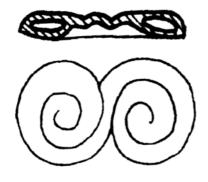


圖 54 內蒙古林西縣井溝子遺存出土之 S 圖 55 內蒙古地區出土帶扣上的 S 形雙渦旋紋 形雙渦旋紋銅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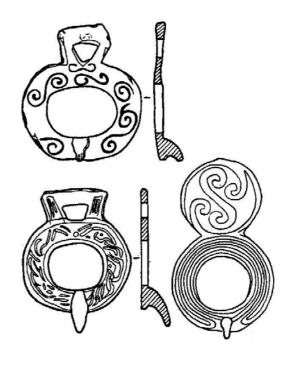






圖 56 蒙古諾音烏拉匈奴墓葬中毛織物上的 S 形雙渦旋紋飾



圖 57 西藏阿里地區日土縣任姆楝岩畫的 S 形雙渦旋紋



圖 58 西藏阿里地區日土縣康巴若久岩 畫的 S 形雙渦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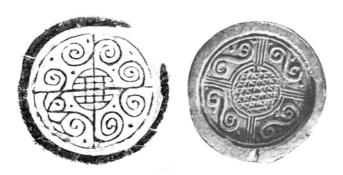




圖 59 關中雍城(左)及咸陽(右)出土的秦國 S 形渦旋紋瓦當 圖 60 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的 S 形渦旋紋瓦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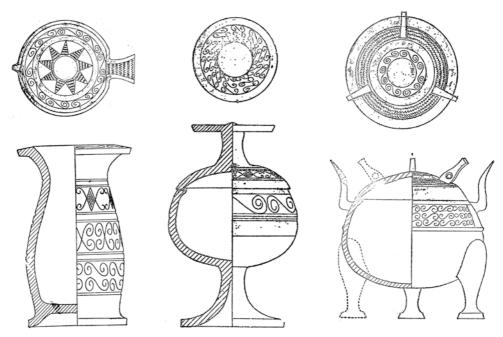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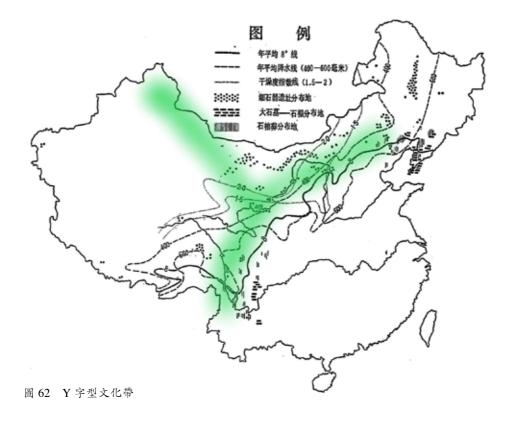


圖 61 戰國中山國國王嚳墓出土陶器上的 S 形渦旋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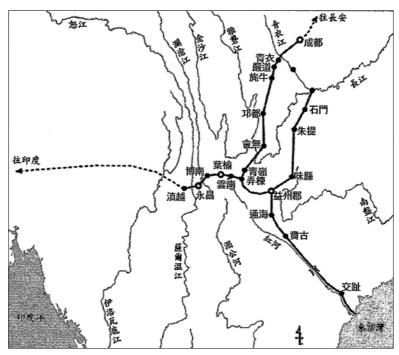




圖 63 秦漢時期的西南絲綢之路